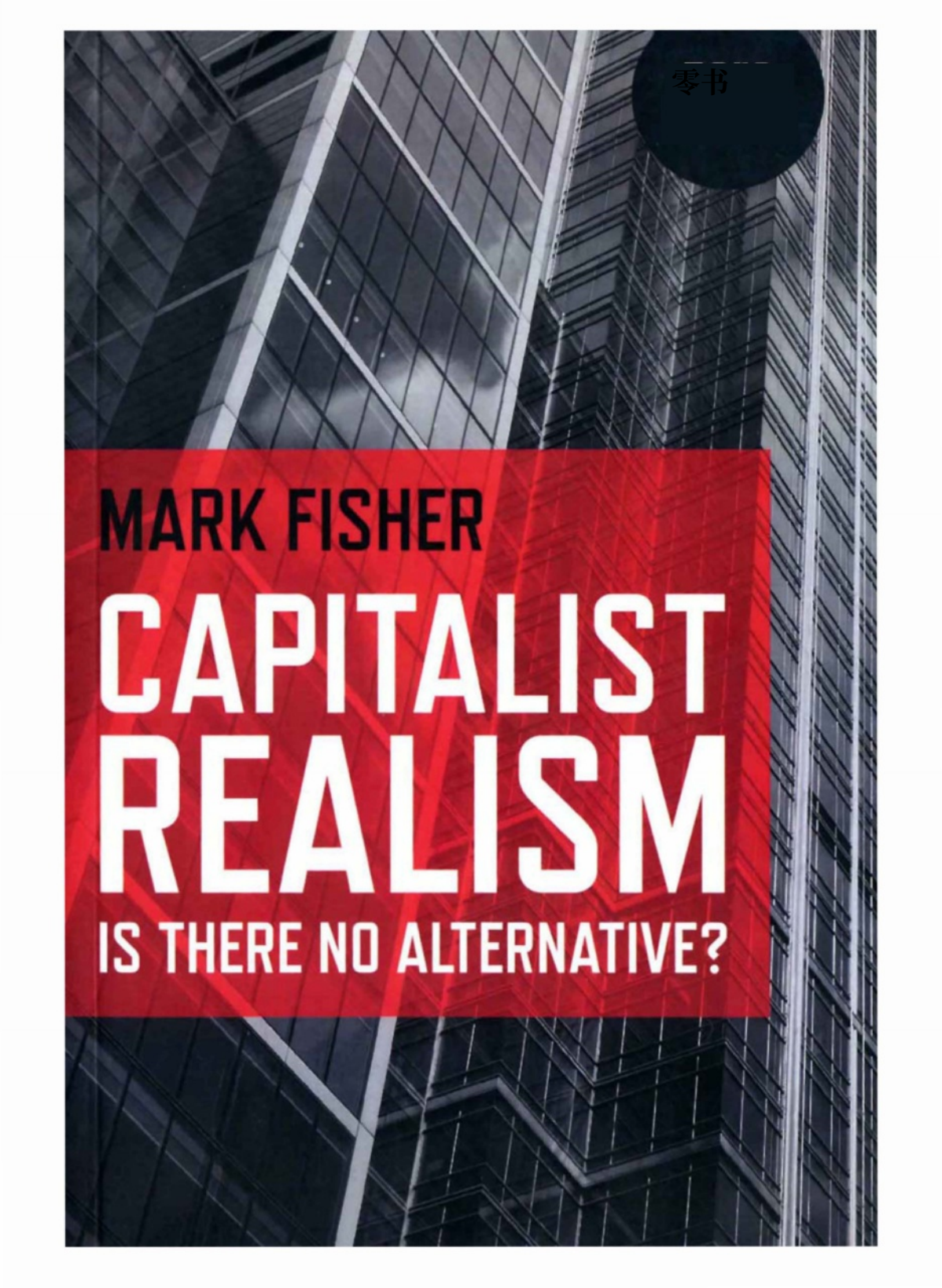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low-angle,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modern skyscraper with a glass facade. The building's lines converge towards the top of the frame, creating a sense of height and scale. A semi-transparent red rectangle is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 serving as a backdrop for the title and author's name.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there is a dark circular logo contain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零书' (Zero Book).

零书

MARK FISHER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马克·费希尔是作家、理论家和教师。他的文章经常出现在frieze, New Statesman, The Wire和Sight & Sound上。他是控制论文化研究小组的创始成员之一。他现在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文化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也是伦敦城市文学学院的哲学导师。他的博客可在<http://k-punk.abstractdynamics.org>找到。他已婚，住在萨福克郡。

致我的妻子Zöe，我的父母鲍勃和琳达，以及
我网站的读者们

内容

1: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 资本主义的终结	1
2:如果你举行抗议，所有人都来了呢?	12
3:资本主义与现实	16
4:反身性无能，静止和 自由共产主义	21
5:1979年10月6日：“不要让自己被依附 依恋任何事物	31
6:所有坚实的东西都融化成公关:市场斯大林主义和 官僚反生产	39
7:……如果你能看到一个现实的重叠与 另一个: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梦想和 记忆障碍	54
8:没有中央交换	62
9:马克思主义的超级保姆	71

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更容易

在阿方索Cuarón 2006年的电影《人类之子》中，克莱夫·欧文饰演的角色西奥在巴特西发电站拜访一位朋友，那里现在是政府大楼和私人收藏的结合。文化瑰宝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平克·弗洛伊德的充气猪——被保存在一座建筑里，而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件翻新的文物。这是我们对精英们生活的唯一一瞥，他们躲避着一场灾难的影响，这场灾难导致了大规模的不育：整整一代人都没有孩子出生。西奥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看到，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不在场证明不能再是后代了，因为没有后代了。回应是虚无主义的享乐主义：“我尽量不去想它。”

《人类之子》中反乌托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这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反乌托邦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极权主义场景(例如，詹姆斯·麦克泰格2005年的《V字仇杀队》)。在这部电影所依据的詹姆斯(P.D. James)的小说中，民主被搁置，国家由一个自封的监狱长统治，但这部电影明智地淡化了这一切。就我们所知，无处不在的专制措施本可以在一个理论上仍然民主的政治结构中实施。反恐战争已经让我们为这样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危机的正常化产生了一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为应对紧急情况而采取的措施的废除变得不可想象(战争何时结束?)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观看《人类之子》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想起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和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Zizek)说过的一句话：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更容易。这个口号准确地抓住了我所说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一种普遍的感觉，即资本主义不仅是唯一可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且现在甚至不可能想象出一个连贯的替代方案。曾经，反乌托邦电影和小说就是这种想象行为的练习——它们所描绘的灾难充当了不同生活方式出现的叙事借口。

《人类之子》却不是这样。它所投射的世界似乎更像是我们的外推或恶化，而不是它的替代品。在它的世界里，就像在我们的世界里一样，超威权主义和《资本论》绝不是不相容的：拘留营和特许经营咖啡馆并存。在《人类之子》中，公共空间被遗弃，留给了未收集的垃圾和跟踪的动物(一个特别引起共鸣的场景发生在一所废弃的学校里，一只鹿从学校里跑过)。新自由主义者，卓越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者，庆祝公共空间的毁灭，但与他们的官方希望相反，《人类之子》中没有国家的消亡，只是将国家剥离回其核心的军事和警察功能(我说的是“官方”希望，因为新自由主义秘密地依赖于国家，即使它在意识形态上对国家进行了谴责。这一点在2008年银行业危机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邀请下，国家匆忙介入，以支撑银行体系。)

《人类之子》中的灾难既不是在等待，也不是已经发生了。相反，它正在经历。灾难没有准时发生的时刻；世界不会在一声巨响中结束，它会眨眼，解体，逐渐分崩离析。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谁知道；它的原因远在过去，与现在完全无关，似乎是一个邪恶生物的反复无常：一种消极的奇迹，一种任何忏悔都无法改善的诅咒。这样的祸患

枯萎病只能通过干预来缓解，而这种干预与最初诅咒的发作一样，是无法预测的。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毫无意义的希望才有意义。迷信和宗教——无助者的首选手段——泛滥了。

但灾难本身又如何呢？很明显，不孕不育的主题必须以隐喻的方式来解读，作为另一种焦虑的置换。我想说的是，这种焦虑迫切需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而影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文化在没有新事物的情况下能坚持多久？如果年轻人不再有能力制造惊喜，会发生什么？

《人类之子》让人怀疑世界末日已经到来，认为未来很可能只会是重复和重新排列的港湾。难道不会有中断，不会有“新事物的冲击”来临吗？这样的焦虑往往会导致两极的振荡：“微弱的救世主”希望一定会有新的东西在路上，变成了忧郁的信念，认为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会发生。焦点从“下一件大事”转移到“最后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多久了？它有多大？

艾略特在《人类之子》的背景中若隐若现，毕竟它继承了《荒原》的贫瘠主题。影片结尾的题词“shantih shantih shantih shantih”更多的是与艾略特的碎片有关，而不是奥义书的和平。也许我们可以在《人类之子》中看到另一个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艾略特——所关注的问题。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艾略特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之前，描述了规范与新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新定义自身是对已经确立的东西的回应；与此同时，既得利益者必须根据新事物重新配置自己。艾略特的主张是，未来的枯竭甚至没有留给我们过去。当传统不再受到质疑和修改时，它就毫无意义了。仅仅保存下来的文化根本就不是文化。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电影中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的命运——曾经是对法西斯暴行的痛苦和愤怒的嚎叫，现在是一幅挂在墙上的壁画——堪称典范。就像它在电影中的巴特西悬挂空间一样，这幅画只有在被剥夺任何可能的功能或背景的情况下才被赋予“标志性”的地位。当不再有新的眼睛看到它时，任何文化物品都无法保持它的力量。

我们不需要等到《人类之子》在不久的将来到来，就能看到文化变成博物馆藏品的这种转变。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力量部分源于资本主义包容和消费所有历史的方式：其“对等体系”的一个影响是，它可以赋予所有文化对象，无论是宗教肖像，色情，在《资本论》上，货币价值。在大英博物馆里走走，你会看到从生活世界中撕扯出来的物品，像在某种掠夺者(Predator)宇宙飞船的甲板上一样被组装起来，你会对这个过程的作用有一个强有力的印象。在将实践和仪式转化为纯粹的审美对象的过程中，以前文化的信仰被客观上讽刺了，被转化为人工制品。因此，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现实主义；它本身更像是现实主义。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

《资本论》把宗教狂热、侠义热情、市侩感伤主义的最神圣的狂喜，淹没在利己主义算计的冰冷的水中。它把个人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用那惟一的、毫无良心的自由——自由贸易——来代替无数不可剥夺的特许自由。总而言之，它用赤裸裸的、无耻的、直接的、残酷的剥削取代了被宗教和政治幻想所掩盖的剥削。

当信仰在仪式或象征性的阐述层面崩溃时，剩下的就是资本主义，剩下的就是在废墟和遗迹中跋涉的消费者-旁观者。

然而，这种从信仰到美学，从参与到旁观的转变，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点之一。正如巴迪欧所说，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声称，它已经“将我们从‘过去的意识形态’所激发的‘致命抽象’中拯救出来”，它将自己呈现为保护我们免受信仰本身所带来的危险的盾牌。后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反讽距离态度，理应使我们免于狂热主义的诱惑。我们被告知，降低我们的期望，是保护我们免受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侵害的小小代价。“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之中，”巴迪欧说。

一种残酷的、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有的存在都只以金钱来衡量——被作为理想呈现给我们。为了证明他们的保守主义是正确的，现存秩序的拥护者们不能真正把它称为理想的或美妙的。因此，他们决定说其他一切都是可怕的。当然，他们说，我们可能不会生活在完美善良的状态中。但我们很幸运，我们没有生活在邪恶的状态中。我们的民主并不完美。但总比血腥的独裁要好。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但它不像斯大林主义那样罪恶。我们让数百万非洲人死于艾滋病，但我们不会像米洛舍维奇那样发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言。我们用飞机杀死伊拉克人，但我们不会像在卢旺达那样用砍刀割断他们的喉咙，等等。

这里的“现实主义”类似于抑郁症患者的通缩观点，他们认为任何积极的状态，任何希望，都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德勒兹和瓜塔里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无疑自马克思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他们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困扰着所有以前社会制度的黑暗潜力。他们认为，资本是“不可名状之物”，是令人憎恶的东西，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当资本主义真正到来时，它带来了对文化的大规模去神圣化。它是一个不再受任何超然法则支配的体系；相反，它拆除了所有这样的法典，只是在临时的基础上重新安装它们。资本主义的界限并不是由法令来固定的，而是以务实和即兴的方式来定义(和重新定义)的。这使得资本主义非常像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的同名电影中的“物”(Thing):一个巨大的、无限可塑的实体，能够代谢和吸收与之接触的任何东西。德勒兹和瓜塔里说，《资本论》是一幅“过去一切的杂色画”；是超现代和古风的奇特混合体。在德勒兹和瓜塔里写完两卷本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之后的几年里，资本主义的去领土化冲动似乎仅限于金融领域，而文化则由再领土化的力量主导

这种不安，这种觉得没有什么新东西的感觉，本身当然也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弗朗西斯·福山在柏林墙倒塌后所宣扬的臭名昭著的“历史的终结”。福山关于历史以自由资本主义达到高潮的论点可能被广泛嘲笑，但在文化无意识的层面上，它被接受，甚至被假设。不过，我们应该记住，即使福山提出了这一观点，认为历史已经到达“终点海滩”的观点也不仅仅是必胜主义。福山警告说，他那光芒四射的城市会闹鬼，但他认为闹鬼的是尼采式的，而不是马克思式的。尼采最具先见之明的几页描述了“一个有历史的时代的过度饱和”。他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写道：“它将一个时代带入一种对自身具有讽刺意味的危险情绪，并随后进入一种更危险的玩世不恭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中，“世界性的指法”，一种超然的观赏性，取代了参与和参与。这是

尼采的最后一个人的状态，他看到了一切。却被这种过度的(自我)意识颓废地削弱了。

福山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镜像。詹姆逊著名地宣称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认为，未来的失败是后现代文化场景的组成部分，正如他正确预言的那样，后现代文化场景将被模仿和复兴主义所主导。鉴于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与消费(或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某些倾向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似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在某些方面，这是正确的。我所说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可以归入后现代主义的范畴，这是詹姆逊提出的理论。然而，尽管詹姆逊做出了英勇的澄清，后现代主义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术语，它的含义，恰当但无益，不稳定和多元。更重要的是，我想说的是，詹姆逊所描述和分析的一些过程现在已经变得如此恶化和慢性，以至于它们已经经历了一种变化。

最后，我更喜欢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词，而不是后现代主义，原因有三个。在20世纪80年代，当詹姆逊第一次提出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点时，至少在名义上，还有资本主义以外的政治选择。然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更深层次、远为普遍的疲惫感，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贫瘠感。在80年代，“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虽然处于崩溃的最后阶段，但仍然存在。在英国，阶级对立的断层线在1984-1985年矿工罢工这样的事件中充分暴露出来，矿工的失败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至少在其象征意义上与其实际影响一样重要。对矿井关闭的辩护，正是基于让矿井继续开放的理由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不是“经济上的现实主义”，矿工们在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无产阶级爱情剧中扮演了最后的角色。80年代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被争取和确立的时期，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学说——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简洁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口号——变成了一个残酷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其次，后现代主义涉及到与现代主义的某种关系。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始于对阿多诺等人所珍视的观点的质疑，即现代主义仅凭借其形式创新就具有革命潜力。相反，詹姆逊看到的是现代主义主题与流行文化的结合(例如，超现实主义技术突然出现在广告中)。与此同时，随着特定的现代主义形式被吸收和商品化，现代主义的信条——它对精英主义的所谓信仰和它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文化模式——以“差异”、“多样性”和“多重性”的名义受到挑战和拒绝。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再与现代主义进行这种对抗。相反，它认为现代主义的被征服是理所当然的:现代主义现在是一种可以周期性回归的东西，但只是作为一种冻结的审美风格，永远不会作为一种生活理想

第三，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整整一代人已经过去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不得不面对如何遏制和吸收外部能量的问题。而现在，它实际上面临着相反的问题:在太成功地整合了外部性之后，如果没有一个它可以殖民和适应的外部，它怎么能发挥作用呢?对于欧洲和北美大多数二十岁以下的人来说，缺乏资本主义的替代品甚至不再是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无缝地占据了可思考的视野。詹姆逊过去常常惊恐地报道资本主义如何渗入人们的潜意识;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殖民了人们的梦想生活，这一事实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不再值得评论。如果把不久的过去想象成某种充满政治潜力的前堕落国家,那将是危险和误导的,因此,我们不妨记住商品化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化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绕道而行与休养生息、颠覆与融合之间的旧斗争似乎已经结束。我们现在要处理的,并不是以前似乎具有颠覆潜力的材料的整合,而是它们的前整合:资本主义文化对欲望、抱负和希望的先发制人的格式化和塑造。例如,我们见证了“另类”或“独立”文化区的建立,这些文化区无休止地重复着旧的反叛和争论的姿态,仿佛这是第一次。“另类”和“独立”并不是指主流文化之外的东西;相反,它们是主流文化内部的风格,实际上是占主导地位的风格。没有人比Kurt柯本和涅槃更能具身(和挣扎)这种僵局。柯本在他那可怕的疲惫和毫无目的的愤怒中,似乎在为历史之后的一代人的沮丧发出疲倦的声音,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在发生之前就被预测、跟踪、买卖。柯本知道他只是另一个场面,在MTV上没有什么比抗议MTV更好的了;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事先写好的陈词滥调,知道连意识到都是陈词滥调。使柯本瘫痪的僵局正是詹姆森所描述的:就像后现代文化一般,柯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风格创新不再可能的世界,[在那里]剩下的就是模仿死亡的风格,通过面具说话,在想象的博物馆里用风格的声音说话”。在这里,即使成功也意味着失败,因为成功只意味着你是这个体系赖以生存的新肉。但涅槃和柯本对存在的高度焦虑属于一个更古老的时代;是什么接替了他们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是一种毫无焦虑地再现过去形式的模仿摇滚。

柯本的死证实了摇滚乌托邦和普罗米修斯野心的失败和融合。当他去世时，摇滚已经被嘻哈黯然失色，嘻哈在全球的成功正是我上面提到的那种资本预先公司化的先决条件。对于许多嘻哈来说，任何“天真”的希望，即青年文化可以改变任何事情，已经被一种残酷的简化版本的“现实”的冷静拥抱所取代。西蒙·雷诺兹在1996年《连线》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嘻哈界，”

Real有两层意思。第一，它指的是真实的、不妥协的音乐，拒绝向音乐产业出售，并软化其跨界的信息。“真实”也意味着音乐反映了一种“现实”，这种“现实”是由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以及警察对年轻人越来越多的监视和骚扰所构成的。“真实”意味着社会的死亡：它意味着企业对利润增加的反应不是提高工资或改善福利，而是....裁员(为了创造一个没有福利或工作保障的兼职和自由职业者的流动就业池而解雇永久劳动力)。

最终，正是嘻哈对第一种真实的表现——“不妥协”——使得它很容易被第二种真实的吸收，即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现实，在那里这种真实被证明是高度市场化的。黑帮说唱既不像它的许多拥护者所声称的那样，仅仅反映了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也不只是造成了这些状况，正如它的批评者所说，嘻哈音乐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领域相互渗透的循环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将自身转变为一种反神话神话的手段之一。亲和性

嘻哈电影和黑帮电影(如《疤面脸》、《教父》系列电影、《落水狗》、《好家伙》和《低俗小说》)之间的区别，源于它们共同的主张，即剥去了世界的感性幻想，看清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场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一个永远剥削和普遍犯罪的体系。雷诺兹写道，在嘻哈中，“要‘变得真实’就是要面对一种自然状态，狗吃狗，你要么是赢家，要么是输家，而大多数人都是输家。”

同样的新黑色世界观可以在弗兰克·米勒的漫画书和詹姆斯·埃尔罗伊的小说中找到。在米勒和埃尔罗伊的作品中，有一种去神话化的男子气概。他们摆出毫不退缩的观察者的姿态，拒绝美化这个世界，好让它能被装进超级英雄漫画和传统犯罪小说所谓的简单伦理二元中。在这里，“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被强调了，而不是削弱了，因为他们对骇人听闻的贪赃枉法的执著——尽管两位作家对残忍、背叛和野蛮的夸张坚持很快就变成了闹剧。麦克·戴维斯在1992年这样评价埃尔罗伊：“在他的黑暗中，没有光来投射阴影，邪恶变成了法庭上的平庸。”其结果感觉非常像里根-布什时代的实际道德结构：腐败的过饱和，不再引起愤怒甚至兴趣。”然而，正是这种脱敏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发挥了作用：戴维斯假设，黑色洛杉矶的作用可能是“支持里根人的出现”。

如果你举行抗议，所有人都来了呢？

在黑帮说唱和埃尔罗伊的案例中，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采取了一种对资本最无情掠夺的超级认同的形式，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远不排除某种程度的反资本主义。毕竟，正如齐泽克挑衅性地指出的那样，反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中广泛传播。一次又一次，好莱坞电影中的反派最终会变成“邪恶的公司”。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姿态非但没有削弱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反而强化了它。以迪士尼/皮克斯的《机器人瓦力》(2008)为例。影片展示了一个被掠夺到人类无法再居住的地球。毫无疑问，消费资本主义和公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大公司Buy n Large——对这种掠夺负有责任；而当我们最终看到被放逐在外世界的人类时，他们幼稚而肥胖，通过屏幕界面进行互动，坐在大型电动椅子上四处走动，从杯子里喝着不确定的泔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控制和交流的愿景，就像让·鲍德里亚所理解的那样，在这种愿景中，征服不再以从属于外在奇观的形式出现，而是邀请我们进行互动和参与。似乎电影观众本身就是这种讽刺的对象，这促使一些右翼观察家厌恶地退缩，谴责迪士尼/皮克斯攻击自己的观众。但这种讽刺助长了而不是挑战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像《机器人瓦力》这样的电影体现了罗伯特·法勒所说的“互动”：这部电影为我们展示了我们的反资本主义，允许我们继续消费而不受惩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不是制造一个

如果你举行抗议呢…？

以宣传的方式明确说明某件事，但要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的运作并不依赖于任何主观假设的信仰。没有宣传的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是无法想象的——但资本主义可以完美地进行下去，在某些方面，没有任何人为它提出理由，它可以做得更好。齐泽克在这里的忠告仍然是无价的。他认为，“如果意识形态的概念是一个经典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错觉位于知识之中”，

那么，今天的社会必然出现后意识形态：盛行的意识形态是犬儒主义；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的真理；不把意识形态命题当回事。然而，意识形态的根本层面不是一种掩盖事物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一种建构我们社会现实本身的（无意识的）幻想。而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当然离后意识形态社会还很远。玩世不恭的距离只是一种方式……让自己对意识形态幻想的结构性力量视而不见：即使我们不认真对待事情，即使我们保持着讽刺的距离，我们仍然在做这些事情。

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总体上恰恰在于高估信仰——在内在主观态度的意义上——以牺牲我们在行为中表现出来和外化的信仰为代价。只要我们（在内心）相信资本主义是坏的，我们就可以自由地继续参与资本主义交换。根据齐泽克的观点，资本主义总体上依赖于这种否定的结构。我们相信金钱只是一种没有内在价值的无意义的象征，然而我们却表现得好像它具有神圣的价值。而且，这种行为恰恰依赖于先前的否认——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行动中崇拜金钱，只是因为我们在头脑中已经与金钱保持了一种讽刺的距离。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如果能将企业反资本主义与真正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区分开来，那么企业反资本主义就无关紧要了。然而，即使在其势头因9/11袭击世贸中心而停滞之前，所谓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似乎也向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做出了太多让步。由于它无法提出一种连贯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人们怀疑其实际目标不是取代资本主义，而是减轻其最严重的过度行为；而且，由于其活动的形式往往是举行抗议活动，而不是政治组织，因此有一种感觉，反资本主义运动包括提出一系列歇斯底里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并不期望得到满足。对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来说，抗议活动已经形成了一种狂欢式的背景噪音，而反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与2005年的Live 8这样的超级企业活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过高地要求政治家通过立法消除贫困。

“Live 8”是一种奇怪的抗议；一种大家都能认同的抗议：到底是谁想要贫穷？这并不是说Live 8是一种“堕落”的抗议形式。相反，正是在Live 8中，抗议的逻辑以最纯粹的形式被揭示出来。60年代的抗议冲动预设了一个恶毒的父亲，他是现实原则的先驱者，(据说)残酷而武断地否认了完全享受的“权利”。这位天父拥有无限的资源，但他却自私地——而且毫无意义地——囤积资源。然而，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抗议本身依赖于天父的这种形象；当前全球精英的成功之一就是他们避免认同囤积父亲的形象，尽管他们强加给年轻人的“现实”比他们在60年代抗议的条件要严酷得多。事实上，组织Live 8活动的当然是全球精英们自己——以理查德·柯蒂斯(Richard Curtis)和波诺(Bono)等艺人的形式。

如果你举行抗议呢？

要收回一个真正的政治机构，首先意味着接受我们在欲望层面插入无情的《资本论》绞肉机。在邪恶和无知被放逐到幻想的他者身上时，我们所否认的是我们自己在全球压迫网络中的同谋。需要记住的是，资本主义是一种超抽象的非个人结构，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它将一事无成。对《资本论》最哥特式的描述，也是最准确的描述。《资本论》是一个抽象的寄生虫，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和僵尸制造者；但它转化为死劳动的活肉是我们的，它制造的僵尸是我们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精英们就是我们的仆人；他们从我们这里提供的悲惨服务，就是洗白我们的性欲，义无反顾地为我们再现我们否认的欲望，仿佛这些欲望与我们毫无关系。

自1985年最初的“现场援助”音乐会以来，意识形态敲诈就一直存在，坚持认为“有爱心的个人”可以直接结束饥荒，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治解决方案或系统重组。我们被告知，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政治必须以伦理即时性的名义暂停。波诺的红色产品品牌甚至想省去慈善中介。波诺宣称：“慈善事业就像嬉皮音乐，牵着手。”“红色更像朋克摇滚、嘻哈，这应该感觉像硬商业。”重点不是提供资本主义的替代品——相反，红色产品的“朋克摇滚”或“嘻哈”特征在于它“现实地”接受了资本主义是唯一的 game。不，其目的只是为了确保特定交易的部分收益用于公益事业。他们的幻想是，西方消费主义与全球系统性不平等根本没有内在联系，而是可以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买到合适的产品。

资本主义与现实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原创的词。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群德国波普艺术家和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他1984年出版的《广告，不安的劝说》(Advertising, the Uneasy Persuasion)一书中就使用了这个词，这两个人都在模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使用这个词的新颖之处在于，我赋予它的含义更为宽泛——甚至过于夸张。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能局限于艺术或广告的准宣传方式。它更像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不仅制约着文化的生产，也调节着工作和教育，充当着一种无形的屏障，约束着思想和行动。

如果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如此无缝，如果当前的抵抗形式是如此无望和无力，那么有效的挑战从何而来？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强调它导致痛苦的方式，只会强化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贫穷、饥荒和战争可以被呈现为现实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希望这些形式的痛苦可以轻易消除的想法则被描绘成天真的乌托邦主义。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只有在被证明在某种程度上不一致或站不住脚时才会受到威胁；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表面上的“现实主义”被证明根本不是这样的话。

不用说，什么是“现实的”，什么在社会领域的任何一点上似乎都是可能的，都是由一系列政治决定来定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除非被归化，否则永远不可能真正成功，而当它仍然被认为是一种价值而非事实时，它就不可能被归化。因此，新自由主义试图消除这种非常

资本主义与现实

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范畴。在过去的30年里，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商业本体论”，在这个本体论中，很明显，社会上的一切，包括医疗和教育，都应该像企业一样经营。正如从布莱希特(Brecht)到福柯(Foucault)和巴迪欧(Badiou)的许多激进理论家所坚持的那样，解放政治必须始终摧毁“自然秩序”的表象，必须揭示被视为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东西仅仅是偶然的，就像它必须使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看起来是可以实现的一样。值得回顾的是，目前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东西本身曾经是“不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大量私有化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当前的政治经济格局(工会暂时搁置，公用事业和铁路非国有化)在1975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相反，曾经非常可能的事情，现在却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巴迪欧痛苦地指出，“现代化”是对可能性的严格而卑躬屈膝的定义。这些‘改革’总是旨在使过去可行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变得不可能，使过去不可行的事情(对占统治地位的寡头来说)变得有利可图。”

在这一点上，也许值得从拉康精神分析中引入一个基本的理论区别，齐泽克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给予当代货币：真实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Alenka祖潘契克所解释的那样，精神分析对现实原则的假设使我们对任何表现为自然的现实产生怀疑。祖潘契克写道，“现实原则”

不是某种与事物存在方式相关联的自然方式……实在性原则本身是意识形态中介的；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这种意识形态将自己呈现为经验事实(或生物的、经济的……)必然性(而且我们倾向于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认为是非意识形态的)。正是在这里，我们最应该警惕意识形态的作用

对拉康来说，实在是任何“实在”必须压制的东西;事实上，实在正是通过这种压抑来构成它自己。真实是一个不可表征的X，是一个创伤性的空洞，只能在表象现实场域中的断裂和不一致中瞥见。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策略可能包括援引资本主义呈现给我们的现实背后的真实。

环境灾难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在一个层面上，可以肯定的是，绿色问题看起来似乎远非资本主义文化不可代表的空白。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威胁与其说是被压制，不如说是被纳入了广告和营销。这种对环境灾难的处理说明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所依赖的幻想结构:假设资源是无限的，地球本身只是一个外壳，资本可以在某一点上像用过的皮肤一样剥落，任何问题都可以由市场来解决(最后，《机器人总动员》呈现了这种幻想的一个版本——资本无限扩张是可能的，资本可以在没有劳动的情况下增殖——在宇宙飞船“公理号”上，所有的劳动都是由机器人完成的;地球资源的燃烧只是暂时的故障，经过一段适当的恢复期后，资本可以改造地球并重新殖民它)。然而，环境灾难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只是一种拟像，它对资本主义的真正影响太过严重，无法被吸收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绿色批判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资本主义远非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事实上，资本主义已准备好摧毁整个人类环境。资本主义和生态灾难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资本的“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它的“增长”

，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质上反对任何可持续性的概念。

但绿色问题已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已经是一个为政治化而战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想强调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另外两个问题，它们还没有被政治化到类似的程度。第一个是心理健康。事实上，心理健康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运作的一个范例。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坚持将心理健康视为一种自然事实，就像天气一样(但是，话说回来，天气不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一种政治经济效应)。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激进的理论 and 政治(莱因、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等)围绕精神分裂症等极端的精神状况联合起来，他们认为，例如，疯狂不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而是一个政治范畴。但现在需要的，是对更为常见的精神疾病进行政治化。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的普遍性：在英国，抑郁症现在是NHS治疗最多的疾病。在他的书《自私的资本家》中，奥利弗·詹姆斯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精神痛苦率上升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实行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联系。与詹姆斯的观点一致，我想指出，有必要重新定义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压力(和痛苦)问题。与其将其视为个人解决自身心理困扰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就是接受过去三十年来发生的压力的大规模私有化，我们需要问的是：这么多人，尤其是这么多年轻人生病，是如何被接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健康瘟疫”会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有效的社会制度，它本质上是不正常的，而且它看起来有效的成本非常高。

我想强调的另一个现象是官僚主义。在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时，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经常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痛斥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被认为导致了计划经济中的制度僵化和效率低下。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官僚主义被认为已经过时；它是无人哀叹的斯大林主义历史的遗迹。然而，这与大多数在资本主义晚期工作和生活的人的经历不一致，对他们来说，官僚主义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官僚制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改变了形式；而这种新的、去中心化的形式，让它得以扩散。资本主义晚期官僚主义的持续存在本身并不表明资本主义行不通——相反，它表明的是，资本主义实际运作的方式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所呈现的图景大不相同。

在某种程度上，我选择关注心理健康问题和官僚主义，因为它们都在一个文化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这个文化领域正日益被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要性所主导：教育。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一所继续教育学院担任讲师，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将广泛地借鉴我在那里的经历。在英国，继续教育学院曾经是吸引那些通常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的地方，如果他们想要更正式的公立教育机构之外选择另一种教育方式。自从继续教育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初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以来，它们就成为“市场”压力和政府设定目标的对象。他们一直是改革的先锋，这些改革将通过教育系统和公共服务的其余部分展开——一种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实验室，因此，他们是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完美场所。

反身性无能、固定化和自由共产主义

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先辈相比，如今的英国学生似乎对政治漠不关心。当法国学生仍然在街头抗议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处境无比糟糕的英国学生似乎已经听天由命了。但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一种冷漠，也不是一种犬儒主义，而是一种反射性的无能。他们知道事情很糟糕，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但是这种“认识”，这种反身性，并不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状态的被动观察。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反身性阳痿在英国年轻人中形成了一种未言明的世界观，它与广泛存在的病症有关。我接触过的许多青少年都有心理健康问题或学习困难。抑郁症是一种地方病。这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处理最多的一种疾病，而且越来越年轻的人受到这种疾病的折磨。患有不同类型阅读障碍的学生数量惊人。毫不夸张地说，在资本主义晚期的英国，青少年现在几乎被重新归类为一种疾病。这种病态化已经排除了任何政治化的可能性。把这些问题私有化——把它们当作仅仅是由个人神经系统和/或家庭背景的化学失衡引起的——任何社会系统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被排除在外了。

我遇到的许多青少年学生似乎都处于一种我称之为抑郁性享乐症的状态。抑郁症通常被描述为一种快感缺乏的状态，但这种状态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我指的不是由于无法获得快乐，而是由于除了追求快乐之外无法做任何其他事情。有一种“缺少了什么”的感觉——但没有意识到这种神秘的、缺失的享受只能在快乐原则之外获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学生模棱两可的结构定位的结果，他们被困在作为纪律机构的主体的旧角色和作为服务消费者的新身份之间。德勒兹在他的重要论文《控制社会的后记》中，区分了福柯所描述的纪律社会和新的控制社会，前者是围绕工厂、学校和监狱的封闭空间组织起来的，而后者所有的机构都嵌入在一个分散的公司中。

德勒兹认为卡夫卡是分布式、控制论力量的先知，这是控制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一点是正确的。在《审判》中，卡夫卡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无罪释放。明确的无罪释放即使曾经是可能的，也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只有关于古代案件的传说，这些传说提供了无罪释放的实例”）。那么，剩下的两种选择是：(1)“表面上的无罪释放”，被告人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都是无罪的，但可能在以后的某个不确定的时间，面临全部指控，或者(2)“无限期推迟”，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参与（他们希望是一个无限的）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过程，因此可怕的最终判决不太可能即将到来。德勒兹观察到，卡夫卡本人以及福柯和巴勃斯所描绘的控制社会，都是用无限期的延迟来运作的：教育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只要你的职业生涯还在继续，这种训练就会持续下去……带回家的工作……在家工作，下班回家。这种“不确定”的权力模式的一个后果是，外部监控由内部警务接替。只有当你与之串通一气时，控制才会奏效。因此，巴勃斯的“控制成瘾者”形象出现了：上瘾的人

去控制，但不可避免的是，那个被控制所控制的人。

在我任教的大学里，走进几乎任何一间教室，你都会立刻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后学科框架中。福柯煞费苦心地列举了纪律是如何通过强加僵硬的身体姿势而被建立起来的。然而，在我们学院的课堂上，你会发现学生们瘫坐在桌子上，几乎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吃零食(有时甚至吃饱饭)。旧有的学科时间划分方式正在瓦解。严格的纪律制度正在被控制技术所侵蚀，控制技术的体系是永恒的消费和持续的发展。

学院的资助体系意味着，即使它想要排除学生，它也负担不起。资源分配给大学的依据是它们在学业成就(考试成绩)、出勤率和学生留校率方面的成功程度。这种将市场需求与官僚定义的“目标”相结合的做法，是典型的“市场斯大林主义”倡议，目前正规范着公共服务。至少可以说，学生自我激励的增加并没有弥补有效纪律制度的缺乏。学生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连续几周不上课，或者他们没有完成任何作业，他们将不会面临任何有意义的制裁。他们对这种自由的反应通常不是追求项目，而是陷入享乐(缺乏享乐)的困倦：软性麻醉、游戏机带来的舒适食物遗忘、通宵电视和大麻。

要求学生阅读超过几句话，许多人——注意，这些是a-level学生——会抗议说他们做不到。老师们听到最多的抱怨就是阅读太无聊了。在这里，争论的并不是书面材料的内容；被认为“无聊”的是阅读行为本身。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不仅仅是时间——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尊重青少年的麻木，但“过于兴奋而无法集中注意力”的后文学时代的“新肉体”与腐朽的学科体系的狭隘集中逻辑之间的不匹配。无聊仅仅意味着远离短信、YouTube和快餐的交流感官刺激矩阵;暂时拒绝随需而来的源源不断的甜食满足。有些学生想要尼采就像想要汉堡包一样;他们没能理解——消费体系的逻辑助长了这种误解——难以消化，困难在于尼采。

举个例子:我问一个学生，为什么他上课总是戴耳机。他回答说没关系，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演奏任何音乐。在另一节课上，他通过耳机以非常低的音量播放音乐，没有戴耳机。我让他把耳机关掉，他回答说连自己都听不见。为什么不放音乐就戴耳机，或者不戴耳机就播放音乐?因为耳朵上有手机的存在，或者知道音乐正在播放(即使他听不到)，都是一种保证，即母体还在那里，触手可及。此外，在互动的经典例子中，如果音乐还在播放，即使他听不到，那么玩家仍然可以代表他享受音乐。耳机的使用在这里意义重大——流行音乐的体验不是作为一种可能影响公共空间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撤退到私人Oedipod的消费幸福中，一堵与社交隔绝的墙。

被娱乐矩阵所吸引的后果是焦躁不安的互动，无法集中注意力。学生们无法将当前的注意力不集中与未来的失败联系起来，无法将时间整合成任何连贯的叙述，这不仅仅是缺乏动力的症状。事实上，它令人毛骨悚然地想起了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的分析。詹姆逊观察到拉康的精神分裂症理论提供了一个

暗示性审美模式”，用于理解面对新兴娱乐工业综合体时主体性的碎片化。“随着能指链的断裂”，詹姆逊总结道，“拉康精神分裂症患者被简化为纯粹物质能指的经验，或者，换句话说，一系列纯粹的和不相关的时间呈现”。詹姆逊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写作的——也就是说，我的大多数学生都出生在那个年代。我们现在在课堂上面对的，是出生在那种非历史的、反记忆的光点文化中的一代人——也就是说，对这一代人来说，时间总是被切成数字化的微片

如果说纪律的形象是工人囚犯，那么控制的形象就是负债成瘾者。网络空间资本的运作方式是让用户上瘾；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神经罗曼客》(Neuromancer)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让凯斯和其他网络空间牛仔在脱离母体时感到皮肤下的昆虫被拉了出来(凯斯的安非他命习惯显然是对更抽象的速度上瘾的替代品)。那么，如果像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这样的东西是一种病态，那么它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病态——它是被连接到超媒介消费文化的娱乐控制回路中的结果。同样，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阅读障碍可能相当于后阅读障碍。青少年在不需要阅读任何口号的情况下，非常有效地处理资本的图像密集数据——识别能力足以驾驭网络-移动杂志的信息平面。“写作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事。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说：“资本主义是极度文盲。”“电子语言不需要声音或文字，数据处理不需要这两者。”因此，许多成功的商业人士都有阅读障碍(但这种后词汇化的效率是他们成功的原因还是结果?)

教师们现在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压力，要在已故资本家的后识字主体性之间进行调解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消费者和纪律制度的要求(通过考试等)。这是教育的一种方式，它远不是在某种与“真实世界”安全隔绝的象牙塔中，而是社会现实再生产的引擎室，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领域的不一致性。教师被夹在辅导者-娱乐者和纪律-权威者之间。老师想要帮助学生通过考试；他们希望我们成为权威人物，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老师被学生当作权威人物来盘问，这加剧了“无聊”问题，因为任何来自权威场所的东西难道不是先验无聊的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纪律结构在机构中崩溃的时候，教育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纪律制定者的角色。随着家庭在要求父母双方都工作的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屈服，教师现在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充当代理父母，向学生灌输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并为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化程度最低的青少年提供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持。

值得强调的是，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有上大学的法律义务。如果他们想离开，他们可以离开。但是，缺乏任何有意义的就业机会，加上政府愤世嫉俗的鼓励，意味着大学似乎是更容易、更安全的选择。德勒兹说控制社会是建立在债务而不是封闭的基础上的；但有一种方式，让当前的教育体系既负债又封闭学生。这种逻辑坚持认为，为自己的剥削买单——负债，这样你就能找到一份如果你16岁离开学校就能找到的麦当劳工作。

詹姆森观察到，“时间性的崩溃突然将时间的现在从所有可能集中它并使其成为实践空间的活动和意性中释放出来。”但是，对旧类型实践运作的背景的怀旧显然是无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学生不喜欢的原因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嘲笑法国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并不令人惊讶，但它对法国“不动”的嘲弄有一定的道理。当然，掀起最近抗议活动的学生似乎认为他们是在重演1968年5月的事件，他们的父母向戴高乐发起了进攻。”

他们借用了游行的口号(“鹅卵石下面是海滩”),劫持了游行的标志(巴黎索邦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起义似乎是[2005]郊区骚乱的自然后果,那次骚乱促使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然后,是那些贫穷的、少数民族的下层阶级反抗了一个将他们排除在外的体制。然而,最新抗议运动的显著特征是,这次反叛力量站在了保守主义一边。与郊区骚乱的年轻人不同,学生和公共部门工会的目标是阻止变革,并保持法国的现状。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不动者”的做法与另一群同样认为自己是68年的继承人的人的做法是一种反转:所谓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如乔治·索罗斯和比尔·盖茨,他们将贪婪的利润追求与生态关注和社会责任的修辞结合起来。除了对社会的关注,自由共产主义者还认为,工作实践应该(后)现代化,符合“聪明”的概念。正如齐泽克解释的那样,

聪明意味着动态和游牧,反对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相信对话与合作,反对中央集权;信奉灵活性,反对常规;文化和知识与工业生产的对立;在自发的相互作用和自创生中

反对固定的等级制度。

固定主义者含蓄地承认资本主义只能被抵制，永远无法被战胜，而自由派共产主义者则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不道德行为必须用慈善来抵消，这两种观点加在一起，让人感觉到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限制了当前的政治可能性。而固定主义者保留了68式抗议的形式，但以抵抗变革的名义，自由共产主义者积极地拥抱新事物。齐泽克的观点是正确的，自由共产主义远没有构成任何形式的对官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步纠正，而是构成了目前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灵活性”、“游牧主义”和“自发性”是后福特主义控制社会的管理特征。但问题是，任何对灵活性和去中心化的反对都有弄巧成拙的风险，因为要求不灵活性和集中化的呼声，至少可以说，不太可能是非常激励人心的。

无论如何，对“新”的抵制不是左翼能够或应该团结起来的事业。对于如何打破劳动，资本是非常仔细地思考过的；然而，对于在后福特主义的条件下，什么样的策略可以对抗资本，以及可以创新什么样的新语言来应对这些条件，仍然没有足够的思考。反对资本主义对“新”的挪用是很重要的，但要收回“新”不能是适应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条件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太好了，“成功的适应”是管理主义的卓越策略。

巴迪欧和大卫·哈维都喜欢将新自由主义与“复辟”一词联系在一起，这是对资本与新颖性联系的重要纠正。对哈维和巴迪欧来说，新自由主义政治不是关于新事物，而是阶级权力和特权的回归。“在法国，”巴迪欧说，“复辟”指的是国王回归的时期

1815年，大革命和拿破仑之后。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今天，我们把自由资本主义及其政治制度——议会制——视为唯一自然和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化最好被理解为一项“重建资本积累条件和恢复经济精英权力的政治工程”。哈维表明，在一个被普遍描述为“后政治”的时代，阶级战争仍在继续，但只有一方在战斗：富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哈维透露，

收入最高的1%人群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飙升，达到15%。到本世纪末。美国收入最高的0.1%人群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2%上升到1999年的6%以上，而工人薪酬与首席执行官薪酬的中位数之比，从1970年的略高于30:1，上升到2000年的近500比1....美国并非唯一这样做的国家：自1982年以来，英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翻了一番，从6.5%升至13%。

正如哈维所示，新自由主义者比列宁主义者更像列宁主义者，他们利用智库作为知识先锋，创造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得以蓬勃发展的意识形态气候。

固定模式——相当于要求保留福特主义/纪律制度——在英国或其他新自由主义已经站稳脚跟的国家行不通。福特主义在英国已经彻底崩溃，旧的政治组织所在地也随之崩溃。在控制论的最后，德勒兹想知道反控制政治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新形式：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将涉及到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工会的无能:与他们反对纪律或在封闭空间内的整个斗争历史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否能够适应自己,或者他们是否会让位于反对控制社会的新形式的抵抗?我们是否已经掌握了未来形式的大致轮廓,能够威胁到市场营销的乐趣?许多年轻人奇怪地吹嘘自己“有动力”;他们重新要求学徒和永久培训。这取决于他们去发现他们被造来服务的是什么,就像他们的长辈发现的一样,并非没有困难,这些学科的目的。

必须要发现的是一种摆脱动机/去动机二元对立的方法,这样,从控制程序中脱离出来,就不会被视为沮丧的冷漠。一种策略是改变政治格局——从工会对薪酬的传统关注转向后福特主义特有的各种不满形式。在我们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必须更深入地考虑什么是后福特主义。

1979年10月6日：“不要让自己执着于任何事 情。”

有组织犯罪头目尼尔·麦考利在迈克尔·曼1995年的电影《火线》中说：“有一次，一个人告诉我，不要让自己对任何你不愿意在30秒内离开的东西产生依恋，如果你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要了解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之间的区别，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將曼恩的电影与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马丁·斯科塞斯在1971年至1990年间拍摄的黑帮电影进行比较。在《火线》中，配乐不是由与旧国有联系的家族承担的，而是由无根的工作人员承担的，在一个有着抛光铬和可互换的设计师厨房、毫无特色的高速公路和深夜餐厅的洛杉矶。《教父》(the Godfather)和《好家伙》(Goodfellas)等电影赖以生存的所有地方色彩、美食香气和文化特质都被重新粉刷和装修了。

《Heat》的洛杉矶是一个没有地标的世界，是一个品牌扩张的世界，在这里，标志性的领土已经被无休止重复的复制特许经营的远景所取代。在斯科塞斯和科波拉的街道上徘徊的旧欧洲幽灵已经被驱走，与古老的牛肉、仇恨和燃烧的仇恨一起埋在跨国咖啡店下面的某个地方。考虑到“尼尔·麦考利”这个名字，你就可以了解很多关于《Heat》的世界。这是一个匿名的名字，一个假护照上的名字，一个没有历史的名字(讽刺的是，它甚至与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的名字相呼应)。对比一下“考利昂”，就会想起《教父》是以一个村庄命名的。麦考利也许是德尼罗扮演的最接近他自己个性的角色：一个屏幕，一个密码，无深度，冷漠的专业，被剥离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到纯粹的准备、研究、方法(“我做我最擅长的”)。麦考利不是黑手党老大，也不是高高在上、高高在上、高高在上的狂妄自大的首领，这个巴洛克式的等级制度由天主教会的那些庄严而神秘的规章所统治，是用千百次争斗的鲜血写成的。他的手下都是专业人士、实干的企业家-投机者、犯罪技术人员，他们的信条与科萨·诺斯特拉家族的忠诚完全相反。正如麦考利对帕西诺饰演的侦探文森特·汉娜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关系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如果你跟着我，我走你也要走，你怎么能指望维系婚姻呢？”汉娜是麦考利的影子，被迫承担他的非实体性，他永恒的流动性。与任何股东团体一样，麦考利的团队成员是由未来的收入前景凝聚在一起的；其他任何债券都是可选的附加品，几乎可以肯定是危险的。他们的安排是临时的、务实的和横向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可互换的机器零件，没有保证，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与此相比，好家伙们就像是久坐不动的感伤主义者，扎根于垂死的社群、注定灭亡的领地

麦考利所倡导的精神正是理查德·塞内特在《品格的腐蚀：新资本主义下工作的个人后果》一书中所探讨的，这是对后福特主义工作重组所带来的情感变化的里程碑式研究。总结新形势的口号是“不长期”。以前工人可以获得一套技能，并期望通过严格的组织等级制度向上发展，现在他们需要在从一个机构到另一个机构、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的过程中定期重新学习技能。由于工作组织是分散的，横向网络取代了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因此灵活性得到了重视。”呼应麦考利在《热》中对汉娜的嘲弄(你期望如何维持婚姻?)，塞内特强调了这些永久不稳定的条件给家庭生活带来的难以忍受的压力。家庭生活所依赖的价值观

不要让自己被依附

义务、诚信、承诺，这些在新资本主义中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然而，随着公共领域受到攻击，“保姆国家”曾经提供的安全网被拆除，家庭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地方，可以缓解一个不断不稳定的世界的压力。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中的家庭处境是矛盾的，这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期望的：资本主义要求家庭(作为再生产和照顾劳动力的基本手段;作为无政府的社会经济条件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的药膏)，即使它破坏了它(剥夺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给夫妇带来难以忍受的压力，因为他们成为彼此情感安慰的唯一来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马拉齐的说法，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日期：1979年10月6日。正是在这一天，美联储将利率提高了20个点，为“供给侧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铺平了道路，而“供给侧经济学”将构成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现实”。利率的上升不仅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且使生产资料和分配资料的新组织成为可能。福特主义生产线的“僵化”让位于一种新的“灵活”，这个词今天会让每个工人感到脊背发冷。这种灵活性的定义是对资本和劳动力的放松管制，劳动力被临时化(越来越多的工人被临时雇用)，并被外包。

像塞尼特一样，马拉齐认识到，新的条件既需要，也来自于工作环境的日益网络化。福特主义工厂被粗略地分为蓝领和白领两种工作，不同类型的劳动在物理上被建筑本身的结构所划分。在嘈杂的环境中劳动，由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经理和主管们，工人们只有在休息的时候，在厕所里，在工作日结束的时候，或者在他们从事破坏活动的时候，才能接触到语言，因为沟通会中断生产。但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当装配线成为“信息的流动”时，人们通过沟通来工作。正如诺伯特·维纳所说，沟通和控制是相互依存的。

工作和生活变得不可分割。做梦的时候，资本跟着你。时间不再是线性的，变得混乱，分解成点状的分裂。随着生产和分配的重组，神经系统也随之重组。为了作为准时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你必须培养一种对不可预见的事件作出反应的能力，你必须学会在完全不稳定的条件下生活，或者像难听的新词所说的那样，“不稳定”。有工作的时期和失业的时期是交替的。通常情况下，你会发现自己从事一系列短期工作，无法为未来做计划。

马拉齐和塞尼特都指出，稳定工作模式的瓦解部分是由工人的愿望驱动的——正是他们，完全正确地，不希望在同一家工厂工作40年。在许多方面，左派从来没有从《资本论》的动员和代谢中恢复过来，从福特主义的常规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尤其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传统代表——工会和劳工领袖——发现福特主义太合意了；它对抗性的稳定性给了他们一个有保障的角色。但这意味着后福特主义资本的倡导者很容易将自己表现为现状的反对者，勇敢地抵制惯性的有组织的劳工，毫无意义地投入到为工会领导人和政治家服务的徒劳无益的意识形态对抗中，但对推进他们声称所代表的阶级的希望却收效甚微。对抗现在不在外部，不在阶级集团之间的对峙中，而是在内部，在工人的心理中，

作为一个工人，你对老式的阶级冲突感兴趣，但是，作为一个有养老基金的人，你也对他或她的投资收益最大化感兴趣。不再存在可识别的外部敌人。马拉齐认为，其结果是，后福特主义的工人就像《旧约》中离开“奴役之家”后的犹太人：从他们不想回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但也被抛弃，被困在沙漠中，对前进的方向感到困惑。

在个体内部肆虐的心理冲突，不能不造成伤亡。马拉齐正在研究躁郁症的增加与后福特主义之间的联系，如果像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那样，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外部边缘的标志，那么躁郁症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特有的精神疾病。随着不断的繁荣和萧条周期，资本主义本身从根本上是不可减少的两极，周期性地在这两极的狂热（“泡沫思维”的非理性繁荣）和抑郁的衰落之间徘徊。（当然，“经济萧条”一词并非偶然）。在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中，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既依赖又再现了人口的情绪。没有谵妄和信心，资本就无法运转。

似乎随着后福特主义，自1750年左右（即工业资本主义的开始）以来，精神和情感障碍的“看不见的瘟疫”已经悄无声息地蔓延，达到了一个新的尖锐程度。在这里，奥利弗·詹姆斯的工作很重要。在《自私的资本家》一书中，詹姆斯指出，在过去的25年里，“精神痛苦”的比例显著上升。詹姆斯写道，“按照大多数标准”，

1946年出生的人（1982年36岁）和1970年出生的人（2000年30岁）患抑郁症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例如，1982年36岁的女性中有16%的人报告说自己有“神经问题、情绪低落、抑郁”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而在2000年，有29%的30岁的人这么说(男性在1982年是8%，2000年是13%)。

詹姆斯引用的另一项英国研究比较了1977年和1985年人群样本的精神疾病发病率(包括神经症症状、恐惧症和抑郁症)水平。“1977年的样本中有22%的人患有精神疾病，到1986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人口的三分之一(31%)。”由于这些比率在实施詹姆斯所说的“自私”资本主义的国家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得多，詹姆斯假设这是自私的(即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政策和文化的罪魁祸首。具体来说，詹姆斯指出了自私的资本主义是如何激化的

既有抱负，也有可以实现的期望。...在创业幻想社会中，培养了一种错觉，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艾伦·休格(Alan Sugar)或比尔·盖茨(Bill Gates)，而不管这种情况发生的实际可能性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减少了——例如，1958年出生的人比1970年出生的人更有可能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自私的资本家对幸福最有害的毒素是系统性地鼓励这样的观念:物质财富是实现自我的关键，只有富人才是赢家，任何愿意努力工作的人都有机会进入最高层，而不管他们的家庭状况如何。种族或社会背景——如果你没有成功，那只能怪一个人。

詹姆斯关于抱负、期望和幻想的猜想与我自己对英国年轻人“享乐抑郁症”的观察相吻合。

在精神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这说明

不要让自己陷入依恋

新工党在其执政的第三个任期之初就承诺要取消领取丧失工作能力津贴的人，这意味着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申领者都是装病者。与这一假设相反，我们可以推断，大多数申请丧失工作能力津贴的人——人数远远超过200万——都是资本的受害者，这似乎并不是不合理的。例如，很大一部分索赔人是由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坚持认为矿业等行业在经济上不再可行而受到心理伤害的人。(然而，即使从野蛮的经济学角度考虑，关于“可行性”的论点似乎也不太令人信服，尤其是当你考虑到纳税人丧失工作能力和其他福利的成本时。)许多人只是在后福特主义可怕的不稳定条件下屈服了

目前的统治本体论否认了精神疾病有社会原因的任何可能性。精神疾病的化学生物学当然与其去政治化严格相称。将精神疾病视为个体的化学-生物学问题，对资本主义有巨大的好处。首先，它强化了《资本论》对原子个体化的推动(你生病是因为你的大脑化学)。其次，它提供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跨国制药公司可以在其中兜售他们的药品(我们可以用我们的ssri类药物治愈你)。不用说，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神经学上的实例，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的因果关系。例如，如果抑郁症是由低血清素水平构成的，那么仍然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特定个体的血清素水平较低。这就需要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解释;如果左派想要挑战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那么将精神疾病重新政治化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在崛起中看到相似之处似乎并不稀奇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精神痛苦的发生率和评估工人表现的新模式。现在，我们将仔细研究一下这种“新官僚主义”

所有这些坚实的东西都融入了PR:市场斯大林主义和官僚反生产

迈克·贾奇(Mike Judge)的电影《办公空间》(1999)不太受欢迎,就像施拉德(Schrader)的《蓝领》(Blue Collar)(1978)描述70年代的劳资关系一样,它对90年代和00年代的工作场所进行了尖锐的描述。贾奇的电影没有表现工会官员和工厂管理层之间的对抗,而是展示了一个被行政“反生产”僵化的公司:工人们从不同的经理那里收到多份备忘录,说的是完全一样的事情。自然,这份备忘录涉及到一种官僚主义的做法:它的目的是促使员工遵守一种新的程序,即在报告上放上“封面”。为了与“聪明”的精神保持一致,办公空间的管理风格是一种非正式和安静的威权主义的混合体。贾奇指出,同样的管理主义也存在于公司的咖啡连锁店中,那里是办公室职员们放松的地方。在这里,员工被要求用“七件装饰品”(即徽章或其他个人纪念品)装饰他们的制服,以表达他们的“个性和创造力”:这是一个方便的例子,说明“创造力”和“自我表达”如何成为控制社会中劳动的内在特征;正如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扬·穆利埃·布唐(Yann Moulier Boutang)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现在对工人提出了情感上和生产上的要求。此外,粗略地量化这些情感贡献的尝试也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新安排的信息。天赋的例子也指出了另一种现象:官方标准背后隐藏的期望。乔安娜是一家咖啡连锁店的女服务员,她只穿了七件衣服,但经理向她明确表示,尽管官方规定七件就足够了,但实际上是不够的。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她想让自己看起来是那种“只做最低限度工作”的人。

“你知道吗，斯坦，如果你想让我穿37件衣服，”乔安娜抱怨道，“你为什么不做最起码的37件衣服呢？”

“嗯，”经理回答说，“我记得你说过你想表达自己。够了已经不够了。这种综合症对许多员工来说很熟悉，他们可能会发现在绩效评估中“满意”的评分不再令人满意。例如，在许多教育机构中，如果在一次课堂观察后，一位教师被评为“满意”，他们将被要求在重新评估之前接受培训。

最初，官僚主义措施在新自由主义政府的领导下竟然会加强，这似乎是一个谜，因为新自由主义政府以反官僚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姿态出现。然而，新型的官僚主义——“目的和目标结果”、“使命声明”——已经激增，即使新自由主义关于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结束的言论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看起来，官僚主义似乎是一种被压抑的回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重新出现在一个声称要摧毁它的体系的核心。但是，官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中的复兴不仅仅是一种返祖现象或反常现象。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聪明”与行政和监管的增加之间并不矛盾：它们是控制社会中劳动的两个方面。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认为，金字塔式等级制度的扁平化实际上导致了对工人的更多监督。塞尼特写道：“对这种新的工作组织方式提出的一个主张是，它分散了权力，也就是说，让组织中较低层的人对自己的活动有了更多的控制权。”“当然，就拆解旧官僚巨兽所采用的技术而言，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新的信息

所有固体都融化成PR

系统为高层管理者提供了一幅组织的全面图景，使网络中任何地方的个人都没有隐藏的余地。”但是，信息技术不仅使管理人员能够更多地访问数据;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已经激增。这些“信息”大部分是由员工自己提供的。马西莫·德安吉利斯和大卫·哈维描述了讲师在为英国大学的本科学位设置模块时必须遵守的一些官僚措施。对于每个模块，德安吉利斯和哈维写道，

“模块领导者”(ML，即讲师)必须完成各种文书工作，特别是“模块规范”(在模块开始时)，其中列出了模块的“目标和目标”ilo，“评估模式和方法”以及其他信息;以及“模块审查”文件(在模块结束时)，其中ML报告他们自己对模块优点和缺点的评估以及他们对下一年的建议更改;学生反馈总结;以及平均分及其分布情况。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对于整个学位课程，学者们必须准备一份“课程规范”，并制作“年度课程报告”，根据“升学率”、“退学率”、地点和分数分布来记录学生的表现。所有学生的成绩都要根据“矩阵”进行评分。这种自动监控是由外部机构进行评估的补充。学生作业的评分由“外部考官”监督，他们应该在整个大学部门保持标准的一致性。讲师必须受到同行的监督，而各院系则要接受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为期三到四天的定期检查。如果他们是“研究型”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讲师必须每四到五年提交他们的“最好的四篇出版物”，作为研究评估工作的一部分由小组评分(008年由同样有争议的卓越研究框架取代)。德安吉利斯和哈维很清楚，这些只是学者必须执行的一些官僚任务的非常粗略的描述，所有这些都对机构有资金影响。这一连串的官僚程序绝不局限于大学，也不局限于教育:其他公共服务，如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和警察部队，发现自己也陷入了类似的官僚主义转移。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些程序和服务对市场化的固有阻力的结果。(例如，所谓的教育市场化建立在一个令人困惑和欠发达的类比之上:学生是服务的消费者还是产品的消费者?)理想化的市场应该提供“无摩擦”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消费者的欲望将得到直接满足，而不需要监管机构的干预或调解。然而，评估工人的表现和衡量劳动形式的动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难以量化的，不可避免地需要额外的管理层和官僚机构。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对工人绩效或产出的直接比较，而是对该绩效和产出的审计代表之间的比较。不可避免地，短路发生了，工作变得面向表征的生成和按摩，而不是面向工作本身的官方目标。事实上，一项对英国地方政府的人类学研究表明，“人们花更多的精力确保地方当局的服务得到正确的体现，而不是真正改善这些服务。”这种优先次序的颠倒是一个可以毫不夸张地描述为“市场斯大林主义”的体系的标志之一。晚期资本主义从斯大林主义重复的就是这种对符号的重视

所有固体都融化成PR

成就大于实际成就。正如马歇尔·伯曼在描述斯大林1931年至1933年的白海运河工程时所解释的那样:

斯大林似乎是如此地想要创造一个高度可见的发展象征，以至于他以一种只会阻碍项目发展的方式来推动和挤压这个项目。因此，工人和工程师从来没有被允许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设备来建造一条足够深、足够安全的运河，以运输20世纪的货物;因此，这条运河在苏联的商业和工业中从未发挥过任何重要作用。显然，这条运河所能支持的只有客轮，在20世纪30年代，客轮上挤满了苏联和外国作家，他们热情地宣扬这部作品的辉煌。这条运河是宣传的胜利;但是，如果公关活动中投入的一半精力都用于工程本身，那么受害者就会少得多，真正的发展就会多得多——这个项目就会成为一场真正的悲剧，而不是一场真实的人被假事件杀害的残酷闹剧。

在一种奇怪的重复冲动中，表面上反斯大林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新工党政府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即实施那些只有在(PR)表面上才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倡议。新工党政府热衷于推行的臭名昭著的“目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个以铁一般的可预见性反复出现的过程中，目标很快就不再是衡量绩效的一种方式，而成为了目标本身。对学校考试水平下降的焦虑现在是英国夏季的一个常见特征。然而，如果学生的技能和知识不如他们的前辈，这是理所当然的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并不是说考试本身的质量下降了，而是说所有的教学都是为了通过考试。狭隘的“考试训练”取代了对学科更广泛的参与。同样，医院执行许多常规程序，而不是一些严重的紧急手术，因为这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达到评估的目标(手术率、成功率和减少等待时间)。

如果把这种市场斯大林主义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真正精神”的某种偏离，那将是错误的。相反，更确切地说，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维度被它与社会主义等社会项目的联系所抑制，只有在图像获得自主力量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才会出现。当然，股票交易所产生价值的方式较少取决于公司“真正做什么”，而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对其(未来)业绩的看法和信仰。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中，所有坚实的东西都融入了PR，而晚期资本主义的定义至少与这种普遍存在的公共关系生产趋势一样多，因为它是由市场机制的强加所决定的。

在这里，齐泽克对拉康“大他者”概念的阐述是至关重要的。大他者是集体的虚构，是任何社会场域预设的象征结构。大他者本身永远无法遭遇；相反，我们只能面对它的替身。这些代表绝不是永远的领导者。例如，在上面的白海运河的例子中，斯大林本人并不是大他者的代表，而是苏联和外国作家必须被这个项目的荣耀所说服。大他者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它并非无所不知。正是这种对大他者的结构性无知，使得公共关系得以发挥作用。事实上，大他者可以被定义为PR和宣传的消费者，即使没有个人可以相信，也需要相信的虚拟人物。用齐泽克的一个例子来说，谁不知道这一点

所有固体都融化成PR

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S)是破旧和腐败的?没有一个人,他们都太清楚它的缺点了;政府的行政人员也不知道,他们不能不知道。不,大他者被认为不知道——也不被允许知道——res的日常现实。然而,大他者所知道的,即官方所接受的,与实际个人所广泛知道和经历的,两者之间的区别远非“空洞的形式”;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普通的”社会现实得以发挥作用。当大他者不知道的幻觉不能再维持时,维系社会体系的非物质结构就会瓦解。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在1965年的讲话中承认“苏维埃国家的失败”是如此重要。似乎党内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以党的名义实施的暴行和腐败,但赫鲁晓夫的声明使人们再也不可能相信大他者对这些一无所知。

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说了这么多,那么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呢?理解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一种方式,它声称已经放弃了对大他者的信仰。后现代主义可以被解释为对大他者的信仰衰落所引发的复杂危机的名称,正如利奥塔德对后现代状况的著名表述——“对元叙事的怀疑”——所暗示的那样。当然,詹姆逊会认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一种表达,是转向后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模式的结果。尼克·兰德(Nick Land)对“文化向经济的后现代崩溃”给出了最令人欣喜的描述之一。在兰德的作品中,一只控制论升级的看不见的手正在逐步消除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兰德90年代的文本综合了控制论、复杂性理论、赛博朋克小说和新自由主义,构建了一种愿景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资本的行星人工智能:一个巨大的,灵活的,永无止境的裂变系统,使人类的意志过时。在他关于非线性、去中心化的资本的宣言

《崩溃》中,兰德提出了一种“大规模分布式矩阵网络倾向,旨在使维持所有宏观和微观政府实体的ROM命令控制程序失效,并在全球范围内集中自己作为人类安全系统”。这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破碎的现实,其中(病毒的、数字的)信号在自我维持的网络上循环,这些网络绕过了象征,因此不需要大他者作为担保人。这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资本论》作为“不可命名的东西”,但没有他们认为构成资本主义的再领土化和反生产的力量。兰德立场的问题之一,也是它最有趣的地方:恰恰是它假设了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一种只被外在因素而非内在因素所抑制和阻碍的资本主义(根据兰德的逻辑,这些因素是返祖现象,最终会被《资本论》消耗和代谢掉)。然而,资本主义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被“净化”;剥去反生产的力量,资本主义就会随之消失。同样,也没有“剥去”资本主义的进步趋势,也没有逐渐揭开资本主义“真实”的面目:贪婪、冷漠、不人道。相反,由公共关系、品牌和广告在资本主义中实现的“非物质转变”的基本作用表明,为了有效运作,资本主义的贪婪依赖于各种形式的“剥皮”。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与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特征相同,一方面是官方文化,其中资本主义企业表现为对社会负责和关心,另一方面,人们普遍意识到公司实际上是腐败的,无情的,等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后现代性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令人难以置信,就像珠宝商杰拉尔德·拉特纳(Gerald Ratner)付出代价后发现的著名观点那样。

拉特纳恰恰试图绕开象征性，并“告诉它是怎么回事”，他在餐后演讲中把他的商店出售的廉价珠宝形容为“垃圾”。但拉特纳正式做出这一判决的后果立竿见影，而且很严重——公司市值蒸发了5亿英镑，拉特纳本人也丢掉了工作。顾客们以前可能已经知道拉特纳斯销售的珠宝质量很差，但大其他不知道；就在那时，拉特纳斯破产了。

白话后现代主义处理“象征效率危机”的方式远没有尼克·兰德那么强烈，通过对作者功能的元虚构焦虑，以及在电视节目或电影中暴露自己作品的机制，并反射性地纳入对自己作为商品地位的讨论。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去神秘化的姿态，与其说是一种成熟，不如说是一种天真，一种确信过去确实有其他人相信象征主义的信念。当然，事实上，“象征效率”正是通过在物质-经验的因果关系和另一种属于象征的非物质的因果关系之间保持明确的区别而实现的。齐泽克举了一个法官的例子：“我非常清楚，事物是我所看到的样子，这个人是一个腐败的弱者，但我仍然尊敬他，因为他戴着法官的徽章，所以当他说话时，是法律本身通过他说话”。然而，后现代主义的

对现实的犬儒化……不足:当一个法官说话时，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话(法律机构的话)比法官本人的直接现实更真实，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局限于他所看到的，他就会失去他的观点。拉康以他的“les non-dupes errent”来瞄准这个悖论:那些不允许自己陷入象征性欺骗/虚构的人，他们继续相信他们的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眼睛，是最容易犯错的。一个“只相信自己眼睛”的愤世嫉俗者，错过了象征小说的效率，以及它如何构建我们对现实的体验。

鲍德里亚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这种效果的评论:象征的废除并没有导致与真实的直接接触，而是导致了一种真实的流血。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像墙上的苍蝇纪录片和政治民意调查这样的现象——它们都声称以一种不经中介的方式呈现现实——总是会造成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摄像机的存在是否会影响被摄制者的行为?投票结果的公布会影响选民未来的行为吗?这样的问题是无法确定的，因此“现实”总是难以捉摸的:就在现实似乎被抓住的那一刻，现实变成了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用一个被误解的新词来说，这与鲍德里亚的定见有着不可思议的呼应，最成功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最终融合了墙上的苍蝇纪录片元素和互动投票。实际上，在这些节目中有两个层次的“现实”:屏幕上“现实生活”参与者的无剧本行为，以及家中观众不可预测的反应，这些反应反过来影响了屏幕上参与者的行为。然而，TV一直被有关虚构和幻觉的问题所困扰:参与者是否在演戏，压抑自己个性的某些方面，以更吸引我们这些观众?观众的投票是被准确登记的吗，还是有某种手段?《老大哥》TV节目中使用的口号

“你决定”——完美地抓住了反馈控制模式，根据鲍德里亚的说法，这种控制模式已经取代了旧的中央集权形式。我们自己占据了权力的空座，在我们的回应中打电话、点击。TV中的“老大哥”取代了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而我们观众却不是

所有固体都融化成PR

屈从于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更确切地说, 我们被整合进了一个控制回路, 它把我们的欲望和偏好作为它唯一的任务——但这些欲望和偏好又回到了我们身上, 不再是我们的, 而是大他者的欲望。显然, 这些电路并不局限于电视:控制论反馈系统(焦点小组、人口调查)现在是提供所有“服务”(包括教育和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让我们回到了后福特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当然, 官僚主义——官场的话语——与大他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看看齐泽克自己的两个大他者在工作中的例子:一个低级官员, 没有被告知升职, 说对不起, 我还没有被适当地告知这个新措施, 所以我不能帮助你……;一位认为自己因为家里的门牌号而倒霉的女士, 她不能满足于仅仅自己重新刷一个不同的门牌号, 因为“这件事必须要妥善处理, 由负责任的国家机构来做……”我们都熟悉官僚的性欲, 以及某些官员从这种推卸责任的立场中获得的享受(“恐怕不是我的问题, 是规章制度的问题”)。与官僚打交道的挫折感往往会产生, 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做任何决定;相反, 他们只被允许参考(大他者)已经做出的决定。卡夫卡是关于官僚主义的最伟大的作家, 因为他看到了这种否认的结构是官僚主义所固有的。对最终解决K的官方地位的终极权威的追求永远不会结束, 因为大他者本身是无法遇到的:只有或多或少怀有敌意的官员, 从事着解释大他者意图的行为。而这些解释行为, 这些责任的推延, 就是大他者的全部。

如果说卡夫卡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评论员是有价值的, 那就是有价值的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通过揭示极权主义的一个维度，这个维度是不能用专制命令的模式来理解的。卡夫卡对官僚主义迷宫的炼狱般的看法与齐泽克关于苏联体制是一个符号帝国的主张相吻合，在这个体系中，甚至连“权贵阶级”自己——包括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在解读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符号信号。没有人知道这需要什么；相反，个人只能猜测特定的手势或指令意味着什么。在资本主义晚期，即使在原则上，也不可能诉诸于一个能够提供最终官方版本的最终权威，这就极大地加剧了这种模糊性。作为这种症候群的一个例子，让我们再一次转向《继续教育》。在工会官员、大学校长和国会议员之间的一次会议上，学习与技能委员会(LSC)——英国高等教育资金迷宫中心的半官方机构——受到了特别的攻击。教师、校长和国会议员都无法确定特定的指令是如何产生的，因为它们并不存在于政府政策本身。答案是，LSC“解释”了教育和技能部发布的指示。然后，这些解释实现了官僚主义特有的奇怪的自主性。一方面，官僚程序自由浮动，独立于任何外部权威；但正是这种自主性意味着他们表现出一种严重的不妥协态度，对任何修正或质疑都持抵制态度。

后福特主义中审计文化的泛滥表明，大他者的消亡被夸大了。审计或许最好被理解为公关和官僚主义的融合，因为官僚主义的数据通常是为了履行一种促进作用：以教育为例，考试成绩或研究评级会增加(或减少)特定机构的声望。令教师感到沮丧的是，他们的工作似乎越来越多地以给大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为目标。

所有的固体都变成了公共关系

其他的是整理和消费这些“数据”。这里的“数据”被放在引号里，因为许多所谓的信息在审计参数之外几乎没有意义或应用：正如伊娃·伯格伦德(Eeva Berglund)所说，“审计创造的信息确实会产生影响，尽管它如此缺乏局部细节，如此抽象，以至于会产生误导或无意义——除非按照审计本身的审美标准。

新官僚主义的形式不是由特定的工人执行特定的、划定的职能，而是侵入所有工作领域，其结果是——正如卡夫卡预言的那样——工人成为自己的审计员，被迫评估自己的表现。以OFSTED用来检查继续教育学院的“新系统”为例。在旧的制度下，一所学院大约每四年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即一次包括许多课程观察和大量检查员在学院的检查。在“改进”的新制度下，如果一所学院能够证明其内部评估系统是有效的，那么它只需要接受“轻度”检查。但这种“轻检查”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监督和监督从OFSTED外包给了学院，最终外包给了讲师自己，并成为学院结构(以及个别讲师的心理)的永久特征。旧的/重的检查系统和新的/轻的检查系统之间的区别正好对应于卡夫卡对表面无罪和无限期推迟的区分，如上所述。在表面无罪的情况下，你向下级法院的法官请愿，直到他们给你一个不具约束力的缓刑。然后你就可以不上法庭了，直到你的案子重新审理。与此同时，无限期的拖延使你的案件处于法庭的最底层，但代价是一种永远不会结束的焦虑。(OFSTED检查的变化反映在从研究评估工作到研究评估工作的变化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高等教育中的卓越研究框架:定期评估将被一种永久的、无处不在的测量所取代,这种测量只能产生同样的永久焦虑。)

无论如何,并不是说“轻”检查在任何意义上都比“重”检查更适合员工。检查员在学院的时间和他们在旧制度下的时间是一样的。监察员减少的事实并不能减轻检查的压力,这更多的是由于预期可能出现的观察而不得不做的额外的官僚主义粉饰,而不是实际的观察本身。也就是说,这种审视恰好符合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监视的虚拟本质的描述。福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那就是监视的位置并不需要被实际占据。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观察的效果,产生了监视装置的内注。你总是表现得好像你随时都会被监视似的。然而,在学校和大学的检查中,给你打分的主要不是你作为一个老师的能力,而是你作为一个官僚的勤奋程度。还有其他奇怪的影响。由于OFSTED现在正在观察学院的自我评估系统,这就暗含了一种动机,促使学院给自己和教学的评分低于实际水平。其结果是一种后现代资本主义版的毛派自白主义,要求工人不断进行象征性的自我诋毁。有一次,当我们的直线经理在赞扬新的轻型检查制度的优点时,他告诉我们,我们部门日志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足够的自我批评。但别担心,他敦促道,我们所做的任何自我批评都纯粹是象征性的,永远不会被付诸行动;好像在玩世不恭的官僚顺从中,把自我鞭挞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练习的一部分,就不会那么令人士气低落似的。

在后福特主义的课堂里，学生的反身性无能被教师的反身性无能所反映。德·安吉利斯和哈维报告了这一点

标准化和监督的实践和要求显然给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很少有人对此感到高兴。对此已有不少回应。经理们经常建议没有其他选择(TINA)，并且可能建议我们需要做的是“更聪明地工作，而不是更努力地工作”。这个诱人的口号是为了抑制员工对进一步变革的抵制，因为在他们(我们)的经验中，变革对工作条件有毁灭性的影响，它试图将“变革的需要”(重组和创新)结合起来，以满足预算压力并增加“竞争力”。员工不仅抵制他们工作条件的恶化，而且抵制“变化”在教育 and 学术上的“无意义”。

“别无选择”的理念，以及“更聪明而不是更努力地工作”的建议，显示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如何为后福特主义的劳资纠纷定下基调。一位讲师讽刺地说，结束监察制度似乎比结束奴隶制更不可能。只有当一个新的(集体的)政治主体出现时，这种宿命论才能受到挑战。

……如果你能看到一种现实与另一种现实的重叠: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梦境和记忆障碍

“现实主义”可能曾经意味着接受一种被体验为坚实和不可动摇的现实。然而,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需要将自己从属于无限可塑的现实,能够在任何时刻重新配置自己。我们面对的是詹姆逊在他的文章《后现代的矛盾性》中所说的“一种纯粹可替代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空间和心灵都可以被随意处理和重塑”。这里的“现实”类似于数字文件中可用选项的多样性,其中没有任何决定是最终的,修订总是可能的,任何以前的时刻都可以在任何时候被回忆起来。我上面提到的中层管理者把适应这种“可替代的”现实变成了一门艺术。他满怀信心地讲了一个关于这所学院及其未来的故事——这次检查可能会有什么影响;高级管理层在想什么;然后真的第二天就会高高兴兴地提出一个与他之前所说的直接矛盾的故事。从来没有一个问题是他的否认之前的故事;就好像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曾经有过另一个故事。我想,这就是“好的管理”。这或许也是在资本主义的永久不稳定中保持健康的唯一途径。从表面上看,这位经理是精神健康的典范,他的整个身体都散发着一股亲切的友善。只有当一个人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批判性的反身性,并且有能力像他一样,玩世不恭地服从官僚权威的每一个指令时,才能保持这种愉快。的愤世嫉俗。

梦境和记忆障碍

依从性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他之所以能保持60多岁时的自由主义自我形象,取决于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如此孜孜追求的审计流程。这种否定依赖的是我上面讨论过的内在主观态度和外在行为之间的区别:就他的内在主观态度而言,经理对他监督的官僚程序是敌对的,甚至是轻蔑的;但就其外在行为而言,他是完全顺从的。然而,正是工人主观地从审计任务中撤资,使他们能够继续从事毫无意义和令人沮丧的劳动。

这位经理从一个现实顺利地转移到另一个现实的能力,让我想起了乌苏拉·勒奎恩的《天堂车床》。这是一本关于乔治·奥尔的小说,一个梦想成真的人。然而,在历史悠久的童话故事里,实现愿望的行为很快就变成了创伤和灾难。例如,当奥尔在他的治疗师哈伯博士的诱导下做了一个梦,梦见人口过剩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数十亿人被瘟疫消灭的世界;正如詹姆森在讨论这部小说时所说,这场瘟疫是“迄今为止不存在的事件,它迅速地在我们对最近过去的记忆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部小说的力量主要在于它对这些回顾性虚构的渲染,这些虚构的机制是如此熟悉——因为我们每天晚上做梦的时候都会这样做——又如此奇怪。我们怎么可能相信接连发生的、甚至是同时发生的、如此明显地相互矛盾的故事呢?然而,我们从康德、尼采和精神分析学中知道,清醒和做梦、体验一样,都依赖于这种筛选叙事。如果真实是无法忍受的,那么我们所建构的任何现实必定是一个不一致的组织。康德、尼采和弗洛伊德与“人生不过是一场梦”这一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的区别在于,我们生活的虚构是双方同意的。这一观点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我们所经历的世界是我们内心投射出来的一种唯我论的错觉，它安慰而不是困扰着我们，因为它符合我们幼稚的无所不能的幻想；但是，认为我们所谓的“内在”的存在要归功于一种虚构的共识，这种想法总是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意味。在《天堂车床》中，当勒奎恩做了奥尔扭曲现实的梦，而其他人——试图操纵和控制奥尔能力的治疗师哈伯和律师希瑟·勒拉切——见证了这一点时，这种额外的不可思议程度得到了体现。那么，经历别人的梦想成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哈伯说不下去了。他感觉到了：转变，到来，变化。

女人也感受到了。她看起来很害怕。她把黄铜项链像护身符一样贴近喉咙，惊愕、震惊、恐惧地凝视着窗外的景色。

[...]对女人会有什么影响？她会理解吗，她会发疯吗，她会怎么做？她会像他一样，保留两种记忆，真实的和新的，旧的和真实的？

她会“疯了”吗？不，一点也不：在困惑的神游片刻之后，希瑟·勒拉切接受了“新”世界作为“真实”世界，编辑掉了缝合点。这种策略——毫无疑问地接受不可通约和毫无意义的东西——一直是理智的典范技术，但它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那是一幅描绘一切曾经存在的杂色画。它对社会虚构的幻想和抛弃，几乎和它对商品的生产和处理一样迅速。

在这些本体论不稳定的条件下，遗忘成为一种适应性策略。以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为例，他权宜之计地重塑了自己的政治同一性，试图诱导集体遗忘。在一篇文章

在《国际社会主义》中，约翰·纽辛格记得如何

布朗在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会议上说，“商业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他的母亲曾是一家公司的董事，“在我成长的环境中，就商业而言，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他一直都是她们中的一员。唯一的问题是，这不是真的。正如他的母亲后来承认的那样，她从来不会称自己为一名女商人：她只在“一家小型家族企业”做过一些轻微的行政工作，并在结婚时放弃了这份工作，那时小戈登甚至还没出生三年。虽然之前也有工党政客试图为自己创造一个工人阶级背景，但布朗是第一个试图创造一个资本主义背景的人。

纽辛格将布朗与他的竞争对手兼前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进行了对比，两者截然不同。布莱尔——这位后现代弥赛亚主义的奇特人物——从来没有任何他必须放弃的信仰，而布朗从长老会社会主义者到新工党领袖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艰苦和痛苦的否定和否认的过程。纽辛格写道：“然而，对于布莱尔来说，拥抱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涉及到巨大的个人斗争，因为他没有先前的信仰需要处理。”有人怀疑，这种努力损害了他的个性。”布莱尔天性和倾向都是“最后的人”；由于意志的力量，布朗成了“最后的人”，成了“历史终结的侏儒”。

布莱尔是一个没有胸脯的人，是该党为了掌权所需要的局外人，他的小丑歇斯底里的脸像推销员一样圆滑；布朗难以置信的自我改造行为，是党本身不得不经历的，他的假笑鬼脸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工党现在已经完全屈服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它的真实状态的客观关联:内脏，没有勇气，它的内部被模拟物所取代，这些模拟物曾经看起来很有光泽，但现在拥有十年前的计算机技术的所有吸引力

在现实和身份像软件一样升级的条件下，记忆障碍应该成为文化焦虑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看看《伯恩》电影、《记忆碎片》、《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在《伯恩》系列电影中，杰森·伯恩(Jason Bourne)在寻求重获同一性的同时，也在不断逃离任何固定的自我意识。“试着理解我……伯恩在罗伯特·Ludlum的原著小说中说道，

我必须知道某些事情……足够做决定…但也许不是全部。我的一部分必须能够走开，消失。我必须能够对自己说，曾经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有一种可能，它从来没有存在过，因为我对它没有记忆。一个人记不住的东西就不存在....对他来说。

在电影中，伯恩的跨国游牧被以一种超快的剪切风格呈现，这种风格起到了一种反记忆的作用，将观众投入到令人眩晕的“连续存在”中，詹姆森认为这是后现代时间性的特征。Ludlum小说中复杂的情节被转化为一系列转瞬即逝的事件——密码和动作片段，几乎无法连贯成一个可理解的叙事。失去了个人历史，伯恩缺乏叙事记忆，但保留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形式记忆的东西:一种记忆-技术，实践，行动-实际上具身在一系列身体反射和抽搐中。在这里，伯恩受损的记忆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所描述的后现代怀旧模式相呼应，在内容层面上，当代甚至未来的参考模糊了对既定或既定的依赖

梦境和记忆障碍

形式层面的陈旧模型。一方面，这是一种只对当下和当下给予特权的文化——对长期的消灭在时间上既向后延伸，也向前延伸(例如，媒体故事垄断人们一周左右的注意力，然后立即被遗忘);另一方面，这是一种过度怀旧的文化，沉迷于回顾，无法产生任何真正的新奇。詹姆逊对这种时间悖的识别和分析，或许是他对我们理解后现代/后福特主义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他在《后现代的悖论》中指出，我们必须从这种悖论出发，

是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空前的变化率与一切事物空前的标准化之间的等价物——情感与消费品，语言与建筑空间——这似乎与这种可变性不相容……然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没有一个社会像他的社会那样标准化，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时间性之流从未如此均匀地流动。...因此，我们现在开始感受到的——以及作为某种更深刻、更基本的后现代性自身构成而开始出现的东西，至少在其时间维度上是如此——从此以后，一切都屈从于时尚和媒体形象的永恒变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了。

毫无疑问，这是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构成资本主义本身的去属地化和再属地化两股力量之间斗争的另一个例子。如果深刻的社会和经济不稳定导致对熟悉的文化形式的渴望，我们以与伯恩回归他的核心相同的方式回归，也就不足为奇了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反射。与这种情况相关的记忆障碍就是《记忆碎片》中折磨伦纳德的情况，理论上是纯粹的顺行性健忘症。在这里，病情发作前的记忆是完整的，但患者无法将新的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新记忆因此显得充满敌意、稍纵即逝、难以驾驭，患者又被拉回旧记忆的安全地带。无法制造新的记忆:对后现代僵局的简洁表述……

如果记忆障碍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小故障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类比，那么其顺利运作的模型将是梦梦。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但会立刻忘记我们做过的梦;因为我们记忆中的空白和空白都被ps掉了，所以它们不会困扰或折磨我们。梦工作所做的是制造一种虚构的一致性，它掩盖了异常和矛盾，这正是温迪·布朗所指出的，她认为正是梦工作为理解当代形式的权力提供了最好的模型。在她的文章《美国噩梦: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去民主化》中，布朗拆解了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盟，这种联盟在2008年之前构成了美国版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布朗表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运作前提不仅不一致，而且直接矛盾。“如何”，布朗问道，

一种在目的和手段层面上都明确是非道德的理性(新自由主义)与一种明确是道德和监管的理性(新保守主义)是如何相交的?一个掏空意义世界、贬低和贬低生命、公开剥削欲望的项目，如何与一个以固定和强化意义、保护某些生活方式、抑制和调节欲望为中心的项目相交?又是如何

支持以企业为模式的治理与自利的规范社会结构相结合，还是与支持以教会权威为模式的治理与自我牺牲和长期孝顺的规范社会结构相竞争，而这正是被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撕碎的结构？

但是，在布朗所谓的“政治理性”层面上的不一致性并不能阻止政治主体性层面上的共生，而且，尽管它们是从非常不同的指导假设出发的，布朗认为，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共同破坏了公共领域和民主，产生一个在产品中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在政治过程中寻找解决方案的受治理公民。正如布朗所说，

选择主体和被治理主体远非对立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他们之前的柏拉图，将个人选择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开放兼容性理论化，并描绘了民主主体，他们正是因为被一个他们误以为是为自由的选择和需求满足的领域所吸引，才可以为政治暴政或威权主义所利用。

根据布朗的观点，我们可以假设，将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奇怪结合在一起的，是它们共同厌恶的对象：所谓的保姆国家及其附属。尽管表现出反国家主义的言辞，但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并不反对国家本身——正如2008年的银行纾困所证明的那样——而是反对国家资金的特定用途；与此同时，新保守主义的强国家仅限于军事和警察职能，并将自己定义为反对被认为破坏个人道德责任的福利国家。

没有中央交换”

尽管受到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严厉批评，保姆国家的概念仍然困扰着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大政府的幽灵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起着不可或缺的性欲作用。它应该受到指责，恰恰是因为它未能发挥中央集权的作用，人们对它的愤怒就像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对上帝不存在的愤怒一样。詹姆斯·米克在LRB的一篇关于英国水务私有化的文章中写道：“一次又一次”，保守党和工党政府发现，当他们把权力交给私人公司，而这些私人公司搞砸了，选民就会指责政府把权力交给别人，米克当时正在访问图克斯伯里，这是英国的一个城镇，在灾难发生一年后的2007年，这里遭受了严重的洪灾。从表面上看，洪水和随之而来的服务故障是私营水务公司和房屋建筑商的错，但米克发现，大多数当地居民并不这么认为。在图克斯伯里，米克斯写道，

总的来说，人们对政府、议会和环境局没有阻止房屋建筑商的敌意，比对房屋建筑商建造房屋或购房者购买房屋的敌意更大。当保险公司提高保费时，人们更多地指责政府没有在防洪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而不是指责保险公司提高保费，或者指责那些选择住在易受洪水侵袭的山谷但不愿意为此支付额外费用的人。

没有中央交易所。”

这种症状在规模大得多的另一场灾难中重演——2008年的银行危机。媒体关注的焦点是个别银行家的过度行为和政府对危机的处理，而不是危机的系统性原因。我一刻也不想为新工党在这样的灾难中扮演的角色找借口，但必须认识到，对政府的关注，就像对不道德个人的关注一样，是一种偏转的行为。把无能的政府当作替罪羊(跑来跑去收拾它的商界朋友造成的烂摊子)源于恶意，源于对保姆国家的持续敌意，尽管如此，这种敌意与拒绝接受政府在全球资本主义中被边缘化的后果——这也许是一个迹象，在政治无意识的层面上，我们不可能接受没有总体控制者，我们现在拥有的最接近统治权力的东西是模糊的、不负责任的利益集团，它们行使着企业的不负责任。这也许是一个恋物癖的否认案例——“我们非常清楚，政府并没有在幕后操纵，但尽管如此……”这种否认的发生部分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无中心性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尽管人们现在被当作消费者来审问——而且，正如温迪·布朗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政府本身也被当作一种商品或服务来呈现——但他们仍然忍不住把自己看作(如果他们不是)公民。

我们大多数人最接近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直接体验是与呼叫中心的接触。作为资本主义晚期的消费者，你越来越多地存在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中:另一个是完全不同的现实，一个疯狂的卡夫卡式迷宫般的呼叫中心，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在那里，因果关系以神秘莫测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那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奇迹，你失去了回到另一个世界的希望，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在那里，事情似乎运转顺利。有什么能证明新自由主义世界比呼叫中心更好地履行了自己的PR?即便如此，呼叫中心的糟糕经历的普遍性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固有效率率的运营假设，好像呼叫中心的问题不是资本逻辑的系统性后果，这意味着组织如此专注于盈利，以至于他们实际上不能卖给你任何东西。

呼叫中心的经历提炼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现象学:被欢快的PR打断的无聊和沮丧，向不同的训练有素和信息贫乏的特工重复同样沉闷的细节，必须保持无能为力的愤怒，因为它可能没有合法的目的，因为——打电话的人很快就明白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做任何事，即使他们能。愤怒只能是发泄的问题;它是真空中的侵略，针对的是同为体制受害者，却又不可能与之有共通之处的人。就像愤怒没有合适的对象一样，它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在这种对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人情、没有中心、抽象和支离破碎的制度的体验中，你尽可能接近于直面资本本身的人为愚蠢。

呼叫中心焦虑再一次说明，人们对卡夫卡仅仅作为一个描写极权主义的作家的理解很差;一个分散的、市场化的斯大林式官僚机构远比一个有中央权威的机构卡夫卡式。比如，读一读K在城堡里遇到电话系统的凄凉闹剧，你很难不把它看作是呼叫中心体验的不可思议的预言。

与城堡之间没有固定的交换，也没有将我们的电话进一步传送的中心交换。当有人从这里给城堡打电话时，所有下属的仪器

没有中央交换。”

各部门都在打电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几乎所有的部门——我确信这一点——都没有关掉他们的接收器，他们就会打电话。然而，有时，一个疲惫的官员可能会觉得需要一点分心，特别是在晚上和晚上，可能会挂起听筒。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答案，当然，这个答案是一个恶作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谁会在大半夜的时候，用自己私人烦恼的信息来打断一直在疯狂进行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呢？我无法理解，即使是一个陌生人也能想象，当他打电话给索迪尼时，接听电话的是索迪尼。

K的反应预料到了这个人在呼叫中心迷宫里的困惑和沮丧。尽管与呼叫中心工作人员的许多对话显得达达主义式的荒谬，但它们不能被这样对待，不能被视为毫无意义

我当然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不可能知道所有这些奇怪的事情，但我对那些电话交谈并不太相信，而且我始终意识到，只有在城堡里发生的事情才是重要的。

“不，”校长说，牢牢抓住这个词不放，“这些从城堡里打来的电话肯定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不应该有意义呢？城堡里的官员给我的口信怎么可能不重要呢？”

卡夫卡的最高天才在于探索了《资本论》特有的消极无神论：中心缺失了，但我们不能停止寻找它或确定它。这并不是说那里什么都没有——而是说那里的东西没有能力行使责任。

坎贝尔琼斯在一篇题为“应该回收的主题”的论文中从另一个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提出这个问题时，谁是应该回收的主体？”琼斯将一项现在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命令变性，以至于抵制它似乎毫无意义，更不用说不道德了。每个人都应该回收利用；任何人，无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不应该抵制这一禁令。我们循环利用的要求被精确地设定为一种前意识形态或后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它被精确地定位在意识形态始终发挥作用的空间中。但琼斯认为，应该回收的主体预设了不应该回收的结构：在使回收成为“每个人”的责任的过程中，结构把它的责任外包给了消费者，它自己也变得不可见。现在，当对个人道德责任的呼吁从未如此喧嚣时——在她的《战争框架》一书中，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使用“责任”一词来指代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转而押注于最具总体性的结构。与其说每个人——即每一个人——对气候变化负有责任，我们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不如说没有人负有责任，这才是问题所在。生态灾难的原因是一个非个人的结构，尽管它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但它恰恰不是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主体。所需的主体——一个集体的主体——并不存在，然而这场危机，就像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其他全球危机一样，要求它被构建起来。然而，至少从1985年起，英国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对伦理即时性的呼吁——当时，“现场援助”(Live Aid)的共识感伤取代了矿工罢工(Miners Strike)的对抗——这种呼吁永久性地推迟了这样一个主题的出现。

阿兰·帕库拉(Alan Pakula) 1974年的电影《视差视图》(The Parallax View)中，阿明·比文根(Armin Beverungen)在一篇论文中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他认为《视差视图》提供了一种图表，说明某种(商业)道德模式是如何出错的。问题在于

没有中央交易所。”

大多数版本的伦理学所假定的个人责任模型对资本或公司的行为几乎没有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视差视图》是一部超阴谋电影:这部电影不仅讲述了阴谋,还讲述了揭露阴谋的无能;或者,更糟糕的是,讲述了特定类型的调查是如何为他们想要揭露的阴谋提供饲料的。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这个角色不仅因为他正在调查的罪行而被陷害/杀害,巧妙地消灭了他,并通过扣动企业刺客的扳机破坏了他的调查;正如詹姆森在《地缘政治美学》(the地缘政治美学)中对这部电影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他的坚韧,准反社会的个人主义,使他非常容易被陷害。

《视差视图》中可怕的高潮时刻——比蒂饰演的匿名刺客的剪影出现在偏头痛般的白色空间里——对我来说,现在与彼得韦尔的《楚门的世界》中另一部截然不同的电影结尾那扇敞开的门是一样的。但是,在韦尔电影的结尾,地平线上通向黑色空间的门意味着一个完全决定论的宇宙的破裂,存在主义自由所依赖的虚无,视差视图的最后打开的门……向一个被阴谋组织和控制的世界敞开了大门”(詹姆森)。这个拿着步枪站在门口的无名人物是我们最接近阴谋本身的人。《视差视图》中的阴谋从来没有给自己任何解释。它从来没有通过一个恶意的个人来聚焦。《视差视图》中阴谋的利益和动机虽然可能是共同的,但却从未明确表达过(也许甚至没有对那些真正参与其中的人说过或说过)。谁知道视差公司到底想要什么?它本身就处在政治与经济的视差之中。它是政治利益的商业战线,还是整个政府机构都是政治利益的战线?我们不清楚这个公司是否真的存在——不仅如此,我们也不清楚它的目的是否只是假装它不存在,

还是假装它存在。

资本主义中当然存在阴谋，但问题在于，它们本身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有更深层的结构允许它们发挥作用。例如，有人真的认为，如果我们用一群全新的(“更好的”)人取代整个管理和银行阶层，情况会有所改善吗?当然，正相反，很明显，弊端是由结构产生的，只要结构存在，弊端就会自我复制。帕库拉这部电影的力量恰恰在于唤起了企业阴谋所特有的阴暗、无中心的客观。正如詹姆森所观察到的，帕库拉在《视差视图》中捕捉到的是一种特殊的集体情感调性:

对于阴谋的代理人来说，Sorge(关注)是一种微笑的自信，这种关注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是对网络或机构活力的关注，一种无实体的分散注意力或漫不经心地参与到集体组织本身的缺席空间中，而没有笨拙的猜测，从而消耗了受害者的能量。这些人知道，也因此能够把自己作为人物的存在投入到一种强烈而自满的关注中，这种关注的重心在别处:一种全神贯注的关注，同时也是一种冷漠。然而，这种非常不同类型的关注，同样是去人格化的，它带有自己特定的焦虑，就像它无意识地、集体地对单个恶棍没有任何后果一样。

……对个别反派没有任何后果……在让·查尔斯·德梅内塞斯和伊恩·汤姆林森死后，在银行惨败之后，这句话现在引起了多么大的共鸣。詹姆森在这里描述的是公司结构的令人压抑的茧，它在保护的同时也在消亡，它掏空了管理者，使他们的注意力永远被

没有中央交换。”

流离失所，确保他们无法倾听。很多满怀希望进入管理层的人，都有一种错觉，认为他们作为个人，可以改变现状，他们不会重蹈管理者的覆辙，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但看着有人跨入管理层，通常用不了多久，权力的灰色石化就开始将他们纳入其中。正是在这里，这种结构是显而易见的——你几乎可以看到它接管人们，听到它通过他们说话的麻木/沉默的判断

因此，急于将企业结构所偏离的个人道德责任强加于人是错误的。这是道德的诱惑，正如齐泽克所主张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在信贷危机之后保护自己而使用道德——责任将被归咎于所谓的病态个人，那些“滥用制度”的人，而不是制度本身。但逃避实际上是一个两步的过程——因为结构往往会被调用(或隐式或公开地)，恰恰是在属于公司结构的个人有可能受到惩罚的时候。此时，突然间，滥用或暴行的原因变得如此系统性，如此分散，以至于没有任何个人可以被追究责任。希尔斯堡足球惨案、让·查尔斯·德梅内塞斯闹剧以及其他许多案例都是如此。但这种僵局——只有个人才能对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然而这些滥用和错误的原因是企业的、系统性的——不仅是一种掩饰：它恰恰表明了资本主义缺乏什么：什么机构有能力监管和控制非个人的结构？怎么可能惩罚一个公司结构？是的，公司在法律上可以被视为个人，但问题是，公司虽然肯定是实体，但不像个人，因此惩罚公司和惩罚个人之间的任何类比都必然是贫乏的。而且，这并不是说公司就是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一切背后的深层代理人;他们自己也受到终极原因的约束/表达——那不是主体:资本。

马克思主义超级保姆

没有什么比《超级保姆》的典型版本更能清楚地说明齐泽克所认定的父亲功能的失败，以及晚期资本主义中父亲超我的危机了。这个节目提供了一种无情的，尽管当然是含蓄的，对后现代性的放纵享乐主义的攻击。超级保姆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因为她和斯宾诺莎一样，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们处于一种卑贱的状态。他们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既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原因，也无法理解其(通常是有害的)后果。但是，超级保姆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来自孩子们的行为或性格——他们只能被认为是愚蠢的享乐主义者——而是来自父母。正是父母遵循了快乐原则的轨迹，这条阻力最小的道路，才导致了家庭中的大部分痛苦。在一种很快变得熟悉的模式中，父母对安逸生活的追求导致他们同意孩子的每一个要求，这些要求变得越来越暴虐。

就像许多教师或其他曾经被称为“公共服务”的工作人员一样，超级保姆必须解决家庭无法解决的社会化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超级保姆当然会从单个家庭的故障排除转向关注产生同样重复效应的结构性原因。

问题是，晚期资本主义坚持并依赖于欲望与利益的平衡，而过去养育子女的基础是拒绝这种平衡。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父亲的”责任概念已经被纳入了享受的“母亲的”命令性，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如果父母以任何方式阻碍了孩子享受的绝对权利，这似乎是他们的失职。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父母双方都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当父母很少见到孩子时，往往会倾向于拒绝承担告诉孩子该做什么的“压迫性”功能。在文化生产层面上，父母对这一角色的否定，由于“看门人”拒绝做任何事情，只给观众他们已经(似乎)想要的东西，而被加倍了。具体的问题是：如果回归到父亲的超我——家里严厉的父亲，广播中的雷希式的目中无人——既不可能也不可取，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超越由于拒绝挑战或教育而导致的单调的垂死的顺从文化？这样一个巨大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在这样一本简短的书中最终得到回答，这里接下来的内容将相当于一些起点和建议。简而言之，我相信斯宾诺莎提供了最好的资源来思考“没有父亲的家长制”可能是什么样子。

在《与否定作斗争》一书中，齐泽克著名地指出，某种斯宾诺莎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齐泽克认为，斯宾诺莎对以健康概念为基础的伦理学的义务论的拒绝，据称与资本主义的非道德情感工程是一致的。这里最著名的例子是斯宾诺莎对堕落神话和法律基础的解读。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上帝谴责亚当吃苹果并不是因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他告诉他不应该吃苹果，因为它会毒害他。对齐泽克来说，这戏剧性地终结了父亲的功能。一个行为是错的，不是因为爸爸这么说；爸爸说它是错的，只是因为做这件事会对我们有害。在齐泽克看来，斯宾诺莎的行动既剥夺了法在虐待行为中的基础(阉割的残酷切割)，同时也否认了在人的行为中没有基础的代理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超级保姆

纯粹意志的行为，主体承担一切责任。事实上，斯宾诺莎有大量的资源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情感制度，即巴勒斯、菲利普·k·迪克和大卫·柯南伯格所描述的空洞控制装置，在这种装置中，代理被溶解在精神和身体麻醉剂的幻觉阴霾中。与巴勒斯一样，斯宾诺莎表明，成瘾远非一种异常状态，而是人类的标准状态，人们习惯性地被(自己和世界的)固定图像所奴役，陷入被动和重复的行为中。斯宾诺莎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了解我们行为的真正原因时，只有当我们抛开那些使我们陶醉和陶醉的“悲伤的激情”时，我们才能获得自由。

毫无疑问，晚期资本主义通过对(某种形式的)健康的呼吁，明确表达了它的许多禁令。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你就是你吃什么》节目中对工人阶级饮食的无情折磨，似乎确实表明，我们已经处于一种没有父亲的家长式作风中。这并不是说吸烟是错误的，而是它会导致我们无法过上长寿而愉快的生活。但是，这种对健康的强调也有局限性:例如，精神健康和智力发展几乎没有得到重视。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简化的、享乐的健康模式，就是“感觉良好，看起来很好”。告诉人们如何减肥，或如何装饰他们的房子，是可以接受的;但呼吁任何一种文化改良，都是压迫性的、精英主义的。所谓的精英主义和压迫不可能存在于这样一种观念中，即第三方可能比他们自己更了解某人的利益，因为吸烟者可能被认为要么不知道自己的利益，要么无法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不:问题是，只有某些类型的兴趣被认为是相关的，因为它们反映了被认为是双方同意的价值观。减肥，装修房子，还有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改善你的外表属于“同情主义政权”。

纪录片制片人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在Register.com网站上接受了一次精彩的采访，他描绘了这种情感管理制度的轮廓。

现在，电视会告诉你该感受什么。

它不再告诉你该怎么想了。从《东区人》到真人秀形式的节目，你置身于人们的情感之旅——通过剪辑，它温柔地向你暗示，什么是公认的情感形式。我把它叫做“拥抱和亲吻”。

我从Mark Ravenhill那里抄来的，他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他说如果你现在分析电视，它是一个引导系统——它告诉你谁有坏感觉，谁有好的感觉。而有坏感觉的人则会在最后的“拥抱和亲吻”时刻得到补偿。这真的是一个不是道德引导，而是情感引导的系统。

道德已经被感情所取代。在“自我帝国”中，每个人都“感觉一样”，从来没有摆脱过唯我论的状态。柯蒂斯说：“人们所遭受的痛苦，

被困在自己的内心——在一个个人主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的感觉里，被困在自己的想象里。作为公共服务广播公司，我们的工作带领人们超越自我的极限，在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将继续走下坡路。

BBC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我有一个理想主义的观点，但如果BBC能做到这一点，让人们超越自我，它将以一种超越竞争的方式自我更新。竞争对手痴迷于服务于小自我的人。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默多克虽然大权在握，

被自我困住。那是他的工作，喂饱自我。

在BBC，这是下一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20世纪50年代，告诉人们如何着装，我们所做的是说“我们可以让你从自己身上解放出来”——人们会喜欢的。

柯蒂斯之所以攻击互联网，是因为在他看来，互联网促进了唯我论者的社区、志同道合者的互动网络，他们确认而不是挑战彼此的假设和偏见。这些社区不必在一个有争议的公共空间中面对其他观点，而是退缩到封闭的回路中。但是，柯蒂斯声称，网络游说对旧媒体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不仅使媒体阶层进一步放弃了其教育和领导的功能，它还允许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潮流“欺负”媒体制作人，让他们制作出平淡无奇的节目。

柯蒂斯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它忽略了网络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方面。与柯蒂斯对博客的描述相反，博客可以产生新的话语网络，这些话语网络在网络空间之外的社会领域中没有关联。随着旧媒体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公共关系，消费者报告取代了批评性文章，网络空间的某些区域对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批评性压缩”提出了抵制。尽管如此，参与后现代媒体的互动模拟，MySpace和Facebook的网络自恋，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重复、寄生和墨守成规的内容。看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媒体阶层拒绝家长式的作风，并没有产生一种自下而上的、令人惊叹的多样性文化，而是一种越来越幼稚化的文化。相比之下，正是家长式的文化将受众视为成年人，认为他们能够应对复杂的、对智力要求很高的文化产品。焦点小组和资本主义的原因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反馈系统失败的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使它们产生了非常受欢迎的商品。这不仅是因为人们的欲望已经存在，但对他们隐藏了(尽管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更确切地说，欲望最强大的形式恰恰是对陌生的、意想不到的、怪异的事物的渴望。这些渴望只能由艺术家和媒体专业人士提供，他们准备给人们一些不同于已经满足他们的东西;也就是说，由那些准备承担某种风险的人来提供。马克思主义超级保姆不仅是那个设定限制的人，在我们自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时，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行事的人，而且是那个准备冒这种风险的人，在奇怪的事物和我们对它的胃口上下注的人。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风险社会”比战后社会共识中被认为是古旧的、中央集权的文化更不可能承担这种风险。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 4)播放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Soldier Spy)、品特(Pinter)戏剧和塔可夫斯基(Tarkovsky)电视剧令我既困惑又高兴;正是这个BBC资助了流行前卫的BBC无线电工作室，它将声音实验主义融入了日常生活。在大众已经被消费者所取代的今天，这样的创新是不可想象的。永久性结构不稳定的影响，“长期的取消”，总是停滞和保守，而不是创新。这并不是一个悖论。正如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的上述评论所表明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晚期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是恐惧和玩世不恭。这些情绪不会激发大胆的思考或企业家的飞跃，它们滋生了一致性和对最小变化的崇拜，生产出与那些已经成功的产品非常相似的产品。与此同时，像前面提到的塔可夫斯基的《Solaris》和《潜行者》这样的电影——早在《异形》和《银翼杀手》之后就被好莱坞掠夺了——是在表面上奄奄一息的环境下制作的

马克思主义超级保姆

勃列日涅夫苏维埃国家，这意味着苏联充当了好莱坞的文化企业家。既然现在很清楚，一定程度的稳定对于文化活力是必要的，那么要问的问题是：这种稳定如何提供，由什么机构提供？

左派早该停止把自己的野心局限于建立一个大国。但是，“与国家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家或退回到情感和多样性的私人空间，齐泽克正确地认为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统治国家的完美补充。它意味着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新左派的目标不应该是接管国家，而应该是使国家服从于公意。这自然涉及到复兴“公意”这个概念本身，复兴——并使之现代化——公共空间的概念不能简化为个人及其利益的集合。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世界观的“方法论个人主义”预设了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的哲学，也预设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或哈耶克(Hayek)的哲学，因为它将公众等概念视为“幽灵”，是缺乏内容的虚幻抽象。唯一真实的是个人(和他们的家庭)。这种世界观失败的症状无处不在——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领域，青少年相互射击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医院里孕育着侵略性的超级细菌——所需要的是将结果与结构性原因联系起来。针对后现代主义者对宏大叙事的怀疑，我们需要重申，这些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问题，它们都是单一系统性原因的结果：资本。我们需要开始——仿佛是第一次——制定策略，反对一种既在本体论上又在地理上表现为无处不在的《资本论》。

尽管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表现(和希望)并没有受到2008年信贷危机的破坏。关于资本主义可能很快就会崩溃的猜测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事情很快变得清晰起来，银行纾困远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坚持认为别无选择的大规模重申。允许银行体系崩溃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随之而来的是公共资金大量流入私人手中。然而，2008年发生的事情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意识形态掩护的框架崩溃了。在银行纾困之后，新自由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失去了信誉。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相反，它的假设继续主导着政治经济学，但它们现在不再作为具有自信前进势头的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惯性的、不死的违约。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虽然新自由主义必然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一定是新自由主义。为了自救，资本主义可以回归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或者回归到《人类之子》式的威权主义。如果没有一个可靠和连贯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将继续统治政治经济无意识

但是，即使现在很明显，信贷危机本身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危机也导致了某种精神麻痹的放松。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环境充斥着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所说的“意识形态瓦砾”——又到了元年，新的反资本主义的空间已经被清理出来，这种空间不一定与旧的语言或传统有关。左派的恶习之一是没完没了地排练历史辩论，它倾向于继续讨论喀琅斯达特或新经济政策，而不是为它真正相信的未来进行规划和组织。以前形式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组织的失败不应该成为绝望的原因，但需要抛弃的是对失败政治的某种浪漫的依恋，对失败边缘的舒适地位的依恋。功劳

危机是一个机会——但它需要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投机性挑战，一种复兴的刺激，而不是回归。正如巴迪欧强力坚持的那样，一个有效的反资本主义必须是《资本论》的对手，而不是对它的反应；不可能回到前资本主义的领土主义。反资本主义必须以其自身的、真实的、普遍性来反对《资本论》的全球主义。

至关重要的是，一个真正恢复活力的左派要自信地占领我在这里(非常暂时地)勾画的新的政治领域。没有任何事物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政治化需要一个政治代理人，可以将理所当然的东西转化为可以争夺的东西。如果新自由主义通过整合68后工人阶级的愿望而取得胜利，那么新左派可以从建立新自由主义产生但无法满足的愿望开始。例如，左派应该争辩说，它可以实现新自由主义明显未能做到的事情：大规模削减官僚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关于工作和谁来控制工作的新斗争；对工人自主性的主张(而不是由管理层控制)，以及对某些类型的劳动的拒绝(如过度的审计，这已成为后福特主义工作的核心特征)。这是一场可以赢得的斗争——但前提是一个新的政治主体联合起来；旧的结构(如工会)是否有能力培育这种主体性，或者是否需要形成全新的政治组织，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建立反对管理主义的新形式的工业行动。例如，就教师和讲师而言，应该放弃罢工(甚至禁止记分)的策略，因为它们只会伤害学生和会员(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学院，为期一天的罢工受到管理层的欢迎，因为他们节省了工资账单，同时对学院造成的干扰微不足道)。我们需要的是战略性地退出劳动形式，这将是什么

只有管理层才会注意到:所有的自我监督机制对教育的提供没有任何影响,但没有这些机制,管理主义就不可能存在。与其围绕巴勒斯坦这样的(高尚的)事业进行姿态式的、壮观的政治斗争,现在是时候让教师工会变得更加内在,并抓住危机带来的机会,开始摆脱公共服务的商业本体论。连企业都不能像企业一样经营,为什么公共服务要像企业一样经营呢?

我们必须将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从医疗条件转化为有效的对抗。情感性障碍是被捕获的不满的形式;这种不满可以而且必须向外疏导,指向其真正的原因——资本。此外,资本主义晚期某些类型的精神疾病的扩散为新的紧缩政策提供了理由,处理环境灾难的紧迫性也为这种情况提供了理由。没有什么比配给商品和资源的概念更违背资本主义对增长的结构性的要求了。然而,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是,消费者自我监管和市场本身无法避免环境灾难,这一点正变得清晰起来。对于这一新的苦行僧,有一个实际的例子,也有一个欲望的例子。正如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齐泽克(Zizek)和超级保姆(Supernanny)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无限制的放纵会导致痛苦和不满,那么对欲望施加的限制可能会加速而不是扼杀欲望。无论如何,某种定量配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是集体管理,还是在已经为时已晚的情况下,用专制手段强行实施。这种集体管理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能通过实践和实验来解决。

我们必须把历史终结的漫长黑夜当作一个巨大的机遇来把握。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无处不在的压迫意味著,即使是政治和经济可能性的微光,也会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超级保姆

效果很好。最微小的事件也能在反动的灰色帷幕上撕开一个洞，反动的灰色帷幕标志着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下可能性的地平线。在一种什么都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突然间一切都有可能了。

1989年之后，资本主义表现为唯一现实的政治经济

制度。这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对工作、文化、教育产生了什么影响

还有心理健康?有没有可能想象出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不是某种倒退到声名狼藉的国家控制模式?

我们不要拐弯抹角了:费雪这本让人欲罢不能的书是对我们所处困境的最好诊断。通过日常生活和流行文化中的例子，但在不牺牲理论严谨性的情况下，他无情地描绘了我们意识形态上的苦难....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对耐心的理论和政治工作的清醒呼吁

斯拉沃伊Žižek

马克·费舍尔是一位文化诊断大师，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一书中，他调查了我们当前文化萎靡的症状....这本书对我们似乎深陷其中的普遍犬儒主义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甚至提出了解药的前景

Steven Shaviro

Cowet摄影 Roger Day



Philosophy
UK £7.99
US \$14.95

www.o-books.net封面设计:design Delue

US \$14.95

ISBN 978-1-84694-317-1



9 781846 943171